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
哲学思想介绍

陕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
哲学思想介绍

郭　涤　张瑞生　贾文炳
薛根治　刘德明　武文锦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EG04/18

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
哲学思想介绍
郭 涤 张瑞生 贾文炳
薛根治 刘德明 武文锦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13,6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2094·27 定价：0.35元

前　言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讲到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的重大意义时指出："陈云同志讲过，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主席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讲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多是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见《红旗》杂志1981年第21期）

根据《决议》和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在去年下半年举办了一期哲学进修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八篇著作。我们在这个班的教学辅导稿，经过广泛征求学员意见，修改之后，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哲学思想

介绍》这本书，作为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的辅导性读物。

毛泽东同志的八篇著作，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它把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为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仅要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响，而且还要防止右的思想倾向的侵蚀。为了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把思想统一到《决议》的基本结论上来，就必须学哲学，打根底，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有三个基本的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出发点，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群众路线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独立自主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可见，在这三个基本方面中，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是我们党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毛泽东同志的八篇著作，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习和掌握实事求是的一部完整教材。《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专著，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教导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上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四篇军事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范例。学习四篇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对我们领会和掌握实

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有着极为深刻的教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两篇政治著作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解决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上的运用和发挥，可使我们从中学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制定战略策略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八篇著作，对于提高我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介绍了各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在基本内容这一部分，力图从原著的实际出发，依照原著的思想逻辑，归纳叙述哲学观点，供读者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作参考。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成书仓促，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战争问题的典范
——介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郭　涤（1）
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著作
——介绍《实践论》……………………贾文炳（27）
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论
——介绍《矛盾论》……………………薛根治（54）
分析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介绍《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刘德明（80）
实事求是的光辉篇章
——介绍《论持久战》…………………武文锦（99）
从实际出发确定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原则
——介绍《战争和战略问题》…………郭　涤（121）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
——介绍《新民主主义论》……………张瑞生（133）
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纲领
——介绍《论联合政府》………………张瑞生（153）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战争问题的典范

——介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路线上一场大争论的产物，是为着总结这一时期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

一九二七年，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建立了井冈山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中国革命又开始了新生面。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运用游击战的“十六字诀”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到了江西根据地，又运用诱敌深入的方针，连续打破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在这时便形成了。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

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否定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推行一套所谓的“新原则”。他们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正确的游击战、运动战，强调正规化、阵地战；反对诱敌深入，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迂回曲折，主张“短促突击”；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反对歼灭战，主张击溃战等等。这种左倾错误，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重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根据地受到极端严重的损失，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长征途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这些重大的争论问题做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否定了王明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挽救了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胜利完成后，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重要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为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阶段，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此，翌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的军事著作。

毛泽东同志的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战争问题的典范，不仅是一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它不仅为尔后在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其他军事著作的形成（如《论持久战》的形成）奠定了军事思想的基础，而且也为尔后的许多哲学著作的形成（如《实践论》、《矛盾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我们学习这部著作，不仅要当作军事著作学，更重要的是要当作哲学著作学。通过学习，提高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便卓有成效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斗。

一、研究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如何研究战争，毛泽东同志在本书第一章中明确地告诉我们，研究战争必须首先着眼于规律，了解战争的目的，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战争的全局，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变化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就是研究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研究战争，必须注重战争规律的特点和发展

规律就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掌握它，才能因势利导，促成事物的转化和发展。事物是运动的，所以，任何事物的规律也不是一成不变。战争的规律也是如此。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我们研究战争，“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

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进行的。在这个特殊国度里进行的这场战争，虽然和一切所有的其他战争有着共同的地方，但它必然又有区别于其他一切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由此可知，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战争都各有其特点。它们的规律，依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地域战争的各自特点的发展变化去分析、去研究，才能掌握战争规律，才能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一般和特殊、共性和个性这一辩证法原理灵活地运用于分析和研究战争的规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特别是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无疑是重要的。因为一般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特殊的东西，懂得了一般战争的规律，特别是革命战争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但是，一般不等于特殊，共性不等于个性。一般的东西，共性的东西不能用以去代替特殊的、个性的东西。同样地也不能把一般战争的规律，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毫无取舍地搬到中国革命战争中来。否则，就要犯机械论的错误，也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到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而又深刻的道理。

（二）研究战争，出发于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

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用战争反对战争”是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上出现的战争只有两类，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战争，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而只有正义战争才是拯救人类的旗帜。我们是不要战争、反对战争的，我们要争取的是没有战争、没有侵略的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但是，为了这个永久和平的时代的到来，为了让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在地球上绝迹，我们又必须打起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正义战争的旗帜，用正义战争去反对、去消灭一切非正义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研究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

（三）研究战争，必须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战争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它是由各个局部组成的。作为一个指挥全局的指挥员，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因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一个战役的指挥员，也应了解某种程度上的战略上的规律，就是说要全局在胸，把一个战争全局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关照好。这是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但

是，“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所以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必须重视对战争的各个局部的分析和研究。要从全局观点上、战略观点上研究各个局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在研究战争规律上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指挥战争全局的指挥员，不仅要关照好全局，还要注意抓好“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因为组成全局的各个局部，在全局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它对全局的影响有主要和次要之分。有些局部被破坏了，全局可以不受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局部对全局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有些局部对全局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指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一着。这个决定性的一着，就是战争全局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根据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原理，要求“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行动上”。

但是，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有关全局性的重要的关节，都不是用眼睛一看所能掌握得了的，需要用脑子想一想才能懂得。这是因为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或有关全局性的主要关节是指各个局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及其特点而言的，不仅仅是各个局部本身。这些联系和区别及其特点，是事物的本质。本质在现象之中，但现象不等于本质。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事物。表面现象，而不能看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但若认真思考，本质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有关战争的战略意义上的问题或动作，也是可以了解和可以掌握的。

（四）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这是战争指挥者达到主客观一致的主要方法

战争的指导者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必须使自己的主观指导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这样就可以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军。而要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主要的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具体说来就必须：

第一、从调查入手，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一个好的指挥员，在作战之初，就必须作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以及战斗员、指挥员、武器给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胸中有数，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作战方案来。所以，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生动深刻的论述。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完整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第二、从情况的发展和变化中掌握规律。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守秘密，情况瞬息万变，所以要使指挥大体符合实际，达到主客观一致，认

识情况的过程就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就是说，当执行一个军事计划时，从开始到战局终结又是一个新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由计划到行动的实践过程。在这一新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变化，指挥员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判断，下定新的决心，使原来计划中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部分得以改善，使主观指导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同志指出：计划“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第三、实践出真知。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原理的运用。毛泽东同志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学习指挥战争，不仅要从书本上学习前人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会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这一种学习，书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一种学习，是熟悉不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所以要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到。

第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指挥战争时，充分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战争指导原则上的唯物论。但是，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这是战争指导原则上的辩证法。我们必须重视客观条件的作用，把自己的一切观念都要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但是，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并不等于战争任

务的完成，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主观的指导能力就起着重要的、决定的作用。如果指挥员的主观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诸条件，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计划，那就能够战胜敌人，否则就要被敌人所战胜。这就是两种主观能动性的不同作用。毛泽东同志要求“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

指导战争和做其他任何工作一样，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识从实践始，还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我们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导人们学习战争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好地运用和发挥。

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第一、二次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即将开始的抗日民族战争的状况，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战争的态度的分析，得出的政治结论。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参加革命。但由于它的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因而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

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则由于他们经济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性，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尽管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而且愿意战争得到彻底胜利，但也不能成为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所以，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在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就历史地必然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这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从而领导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所作出的政治结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充当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这是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

然而，要实现党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必须依靠党的路线的正确。在十五年的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党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长征途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都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使我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正是在这些错误和挫折中锻炼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实践证明，正确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今后战争的新阶段，这样的路线将“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之敌人之目的。”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其主要形式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找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制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重要的问题在于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这就明确地指出了肩负中国革命战争领导责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呢？毛泽东同志引用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是认识中国革命特点、中国革命规律，制定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根本方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只所以犯错误，受客观规律的惩罚，就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有别于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看做与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生搬硬套一般战争或苏联战争的经验。他们在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红军作战的情况时，又回到了一般情况方面去，拒绝研究这种变化了的新情况，对敌人反动的新原则熟视无睹，结果使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训，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研究中国革命特点的极端重要性。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及其规律

毛泽东同志不仅给我们指出了认识中国革命特点的重要性，而且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等各方面的情况，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并且阐述了这些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说明大小军阀的割据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不能统一，城市反动势力较强，而边远农村、山区反动统治薄弱并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大革命的影响，革命力量不仅有立足之地，而且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可以与敌人周旋。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红军的敌人是取得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它有数量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装备和世界现代国家大体相同的常备军。由于国民党的政权是全国政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又有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所以同红军比较起来，力量非常强大。处在强大敌人面前的红军，作战方法不能同一般战争及苏联内战一样，也同我国的北阀战争不一样，它有其自己独有的特殊性。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红军弱小的特点，是数量少，武器差，物质供应非常困难。有政权也是分散的、孤立的、没有任何外间援助的山地或僻地政权，经济文化落后，

且流动不定，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第三个特点同第二个特点的尖锐对比，就成为确定红军战略战术的出发点。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创造红军。根据地的政权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给国民党进攻造成很大困难。由于红军人员都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都是为着自己利益而战斗的。所以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对土地革命，得不到人民的援助，军队虽多，但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从而发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他说：在这四个特点中，“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这是就红军作战的有利条件讲的，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这是就红军作战的困难条件讲的。我们要认识事物，就要全面地分析事物，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不利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是互相联系、同时存在的。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在对这个根本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和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十年血战的经验，列举了十四个原则问题。这十四个原则的提出，来自革命战争的实践，是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毛泽东同志在本书的后两章，以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主要军事著作中，对这些原则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决定了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

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这种形式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红军在较长时期内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直到敌人变得弱小，红军变得强大那一天为止，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而红军的活动总是采取反“围剿”的形式。毛泽东同志说，这已为红军十年的战史所证明，“十年的红军战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时期，就是由于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和“围剿”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性的规律，而犯了命令幼小的红军打武汉、打南昌、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决战，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为了反对否认红军采取防御手段的错误意见，讲了防御和进攻的辩证法。他指出，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在政治上说来是对的，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

发展，总是要进攻的，不能保守。但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因为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能说完全对，只是在革命前进时，才是对的，在革命退却时，或全部退却时，就不对了。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左倾机会主义反对使用军事上的防御手段，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毛泽东同志在具体分析革命战争中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了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我们做任何工作，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四、战略防御中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十年红军战争的经验，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实行这一方针的作战原则，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战略上消极防御的错误，对唯物辩证法思想做了创造性地运用。

（一）防御和进攻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而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所以战争一开始就和敌人的“围剿”奋斗。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这一力量对比上的绝对悬殊，所以，首要的和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的问题。因此，战略防御问题，就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对战略防御常常发生两种偏

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一种是被敌人所吓倒，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十年战争的历史证明，不讲战略防御，或采取消极防御都是错误的，都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了损失。

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是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在防御问题上的反映。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在积极防御的基点上展开的。

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是为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所以这种防御又叫做真正防御，符合红军进行战略防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迂回曲折的复杂斗争中转入进攻打破"围剿"。消极防御是专守防御、单纯防御，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进攻，保存地方，而不是为了进攻。这种消极防御，只能挨打，不能还手，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看不到防御和进攻之间的辩证法，是聪明的军事家所不为的。

积极防御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选择弱点，各个击破，聚而歼之，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最后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消极防御是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是筑堡垒，拚消耗，人亡地丢，不但消灭不了敌人，而且也保存不了自己。红军丧失整个南方根据地，转向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中消极防御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从分析战争的性质入手，批驳了法西斯军事家认为防御不能振奋人心，反而动摇人心的谬论。他说，这种说法是在"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

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毛泽东同志由此得出结论：“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所以正义战争的防御战，能够取得更多的人的支持，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作用。

以上分析，就是毛泽东同志战略防御思想的根据和基本内容。如果把防御作为一个事物来看待，它本身也有二重性。消极防御论者，没有看到防御中包含着进攻的因素，把防御绝对化，所以，在强敌面前得出了一种悲观的消极的结论。积极防御的方法论是从对立的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它看到防御的二重性，看到防御中包含着进攻的因素，是为了进攻而防御，从反攻和进攻的需要来理解防御，处理防御中的一切问题，促使防御在一定条件下向反攻和进攻转化，达到消灭敌人的最终目的。

（二）有备无患，立于主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强敌有计划的进行“围剿”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所以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实际上是战略防御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临阵才不至于惊慌失措，被敌人的进攻所吓倒。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指出，准备工作的一个困难问题是何时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减少进攻的利益；准备过迟，在我们发动进攻时，恰好遇上敌人进攻的开始，会使自己处于困难地位。但是，相比之下，“与

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早作准备，则是以逸待劳，有备无患，从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指出，开始准备时机的选择，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各种情况。他说：“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选择开始准备时机时必须重视研究的情况。只有这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各方面的情况，才能比较准确地选择开始准备的时机。毛泽东同志在选择准备反“围剿”的时机上，既不过高或过低地估计敌人，也不过高或过低地估计自己，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做好任何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

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具体规定了准备阶段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种具体、细致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值得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去效法。

（三）战略退却是为了转入反攻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退却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没有战略退却，就不可能转入战略反攻。这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退却与反攻的辩证法。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战略退却。他们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认为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对外产生不良影响。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以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为历史依据，批驳了这种军事上的

形而上学观点。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从战争讲到了一般的方法论，教育人们看任何问题都要这样辩证地看，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取得工作的胜利。他说：“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对战略退却的这种看起来很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这就指出了孤立地静止看问题的社会阶级根源。他们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他们不能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联系起来，把部分和全体联系起来，而是抓住一个局部的东西不放。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党内左倾错误的思想社会根源之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塞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同志在解决对战略退却的认识问题的基础上，还具体分析了战略退却中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实际问题。

第一、毛泽东同志阐述了战略退却的目的。他说：“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在强敌的进

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战略退却的目的，还在于“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第二、毛泽东同志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指出了六个转入反攻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六条中，“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人民这个条件，也就是根据地条件。有了这一条，其他各条容易造成或发现。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由白区退到根据地来，依靠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援助和参加作战，就可以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就可以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使敌人处于处处挨打的被动地位。这是毛泽东同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在作战问题上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体现。

第三、红军作战的其他有利条件是在战略退却过程中才能发现和造成的。这也是战略退却所以必要的理由。毛泽东同志说：“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但是，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往往不是在敌人进攻开始时所能弄清楚的，需要一个暴露过程和侦察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强敌面前要使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只有等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苦头，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而红军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时，才能实现。这个局面的出现，没有战略退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要集中兵力，发现敌

人过失等等，都需要在战略退却中才能解决。有时，其他条件具备，但无隙可乘，还可再退几步。

毛泽东同志对战略退却的重要性和目的性以及所要造成的条件作这样具体细致地分析，就是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彻底纠正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危害的左倾错误，在全党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四）转入战略反攻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反攻是战略防御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就是指这种带决定性的战略反攻。因为在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战略退却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它只“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了战略反攻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战略反攻阶段的复杂性和艰苦性。他说：“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战略反攻时的几个主要的指挥原则。

第一、战略反攻必须掌握好初战三原则。1、初战必胜。就是说“不可率尔应战。”初战的胜利，可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使我们一开始就在精神上压倒了敌人。2、要把初战放在战略的全局上来考

虑。如果初战的胜利对全战略有害无益，即是打胜了，也应该说是失败了。所以打第一仗时，要想到第二仗、第三仗、第四仗以至到最后一仗的大体打法。3、要把初战放在战略转移的长过程中来考虑。也就是“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

第二、战略反攻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战略反攻时，集中兵力作战，是为了改变敌我形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同志说：“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这说明主动就是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是为了变退为进，变守为攻，变内线为外线，将我在战略上的弱者地位，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将敌军在战略上的强者地位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弱者地位。他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第三、反攻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在长时期内，主要作战形式是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这是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改变战略形势，必须采取的基本的战争形式。运动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运动战，有利于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运动战可以避开敌人的正面，敌人的优势，充分发挥红军指挥上的能动性，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毛泽东同志用打和走的辩证法说明在红军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运动战形式的重要。他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运动战

的通俗解释。又说："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我们的基点是要打，要消灭敌人。但是敌人不好打时，就要准备走，在走的过程中，寻机消灭敌人。走和打的辩证法，反映在指挥思想上就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果敌强我弱，敌多我少，硬要打，而不愿走，这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其结果不仅消灭不了敌人，而且也保存不了自己。

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运动战的原则必须是速决战和歼灭战。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战略上的持久战，是说要消灭强大的敌人，不能性急，性急是要吃亏的。但是，正是由于敌人强大我们弱小，所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必须采取速决战。如果说一般的军事原则都要求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话，那么红军对速决的程度要求更高。因为只有战役的速决战，才能及时转移兵力，连续作战，不断歼灭敌人，达到战略反攻之目的。

歼灭战是我们作战的一个基本方针。毛泽东同志说："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必须从战略意义上来理解战役、战斗的歼灭战。毛泽东同志说，杀伤敌人而消耗自己，不如歼灭敌人而补充自己。所以，杀伤敌人，是作为歼灭敌人的手段而采取的，单纯的同敌人拚消耗，红军是拚不过的。再从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来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

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伤其十指，只是事物量的变化，击溃十个师，敌人的编制尚在，稍加补充，就可恢复战斗力。断其一指，是事物带有部分质变的量变，歼灭一个师，就少一个师，而我则增加兵力和给养、武器。这样，歼灭战越多，我的力量增加越大，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越来越小，最后实现战略上消灭敌人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伟大的光辉著作中，坚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论证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中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他立足于中国革命战争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这一基本立场，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从敌强我弱这一总的势态出发，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确定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思想，来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经验证明，打仗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也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任何离开中国实际的主观

臆想，都不可能正确认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战略战术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思想，对我们的工作，有着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战略战术有极大的灵活性。建设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但从实际出发，应该允许在执行方针政策上的灵活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待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从有利于生产发展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比如，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但根据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也应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存在和集体所有制中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存在。不能不顾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忽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律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集体经济内部经营方式上的一刀切。从全国来讲，我们是计划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但不能统得过死，应该允许在服从国家计划的原则下，发挥地方优势，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这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在经济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我们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要学习和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来工作，克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

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阐发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同样的条件，各人的主观努力不同，工作就有好坏之别，成就就有大小之分。所以无论做什么工作，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之后，能否正确地发

挥主观能动性，就成了工作成败的关键。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样。现在的情况是党中央已经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群众又有很高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能否上去，建设能否搞好，决定性的条件，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负责同志的主观努力如何了。要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都能从实际出发，振奋革命精神，善于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自己地区、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采取适合自己地区的办法，并且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去实践它，我们就一定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应该取得的成果。

（郭　涤）

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著作

——介绍《实践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部杰出的哲学著作，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当时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授。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题解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毛泽东同志，其所以在当时必须而且能够写出《实践论》这样的科学著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的斗争任务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实践论》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

革命形势的急速转变，提出了揭露主观主义的迫切要求，这是因为：

其一，主观主义的指导，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并进行活动的。然而，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于中国革命，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长时间内在我们党的领导中没有很好解决。党成立后的十六年

中，在指导上发生了四次错误，使革命遭到两次惨重失败。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全党四年，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看作教条，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了吸取历史教训，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从认识论上揭露主观主义的错误。

其二，广大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迷惑。党的历史证明，没有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和广大干部受到迷惑，教条主义就会受到抵制而不可能长期流毒全党。王明教条主义，打着“马列主义”和“国际指示”的旗号，利用中央的名义，又采取高压手段来推行错误路线。而广大干部由于缺乏理论根底，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容易被左倾口号吓唬住，轻信其为正确，盲目服从；对遭到批评的正确意见，却怀疑其为右倾，盲目反对。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掌握认识论武器，打下根底，也必须从理论上彻底揭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其三，抗日战争开始，主观主义已经成为实行党的正确方针的严重障碍。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独立自主政策。但是，由于主观主义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清算，党内教条主义者，先是搞关门主义，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时又搞投降主义，反对党坚持独立自主；使党内思想比较混乱。所以，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3页。

为了统一全党认识，排除贯彻党的方针的阻力，自觉实现由内战到抗日的历史转变，必须重新教育干部，揭露主观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危害。

由于主观主义，一使革命吃了大亏，二使广大干部受到迷惑，三使实行党的方针遇到阻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它，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可见，揭露主观主义，这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当务之急。这个工作，当时非做不可。《实践论》就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应运而生的伟大著作之一。

《实践论》是党内两条思想路线长期斗争在哲学上的必然概括。

毛泽东同志，一直提倡和实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反对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的主观主义倾向。陈独秀领导时期，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过火，他通过调查，用大量事实进行批驳。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他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受到挫折后，坚决从实际出发，不顾第一次左倾领导的指责，毅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于九月二十日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一九二九年，他总结了党的指导思想犯错误的教训，尖锐指出："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②一九三〇年五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形成的标志。在我党历史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

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他批评本本主义和盲目执行上级指示的形式主义，“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②。这样，毛泽东同志冲破了左倾领导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必须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然而，由于接踵而来的又是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领导。不但不能根本丢掉主观主义，反而更加严重。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步一步继续推向深入。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从根本上揭露主观主义所必要的主客观条件，终于完全成熟了。一是在组织方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就为他正确地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创造了前提。二是在环境方面，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出现了十年不曾有过的安定环境，这就为训练干部、组织学习、总结经验，提供了难得的大好时机。三是在思想方面，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要全面揭露主观主义，思想条件还不成熟。经过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相继对王明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进行了系统的清算；一九三七年的五月和六月，党中央相继召开的苏区和白区党的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指导方针，揭露了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统一了全党认识，这就为从理论上彻底揭露主观主义，作好了思想准备。四是在理论方面，毛泽东同志经过长期对各派哲学的独立研究，于一九二〇年冬，自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

①②见《反对本本主义》第9页。

者，本来就有较好的哲学根底；党成立后的十六年间，又经历了我党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到延安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又发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地深入地钻研，为写作《实践论》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当时，他亲自组织和指导广大干部学习哲学，还把自己研究哲学的成果，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从一九三七年四月到八月，给抗大二期的学员作了系统讲授，并修改印发了记录稿，供大家学习。《实践论》就是当时讲课记录稿的一个重要部分。

根据上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其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写出《实践论》这样深刻的哲学著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深厚根底的。它是适应中国革命发展迫切需要的必然产物，是我们党内两条思想路线长期斗争在哲学上的必然概括，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必然升华。《实践论》的诞生，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达到成熟的标志。《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为我们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言简意赅的概括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践论》就是一部创造性地阐发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科学著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是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统一。毛泽东同志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道理。《实践论》的主要内容，

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认识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有机地贯串起来，全面地作了深刻地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一、《实践论》深刻论证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阐发了实践的科学含义。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和考察世界的行动。实践是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整体：一是有目的的进行活动的人，这是实践的主体；二是实践的手段，包括工具和运用工具的方式；三是实践的客观对象；四是实践的结果。这些要素在实践中是有机结合的，不可缺少的。实践的过程，就是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实践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客观性，也就是列宁说的直接现实性。实践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但它不属于主观思维的活动，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二是能动性。人们在行动之前，就有明确的目的。人们通过实践，不但能动地认识世界，而且能动地改造世界，以满足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是实践的自觉能动性，它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三是社会性。人们的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不是一个人的孤立活动，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四是历史性。任何实践都有历史的延续性；实践的内容、形式、深度、广度都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实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向前发展的。五是多样性。实践的内容是丰富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但实践不限

于这一种形式，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等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诸如工、农、商、学、兵、党、政、财、卫、体等千行百业的活动，都是实践的不同形式。各种形式的实践，作用虽不相同，但都不可缺少，都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对人的认识发生影响。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论证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他强调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他反复说明："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里使用"都是"和"只能"来表明，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他充分论证了为什么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其一，这是由认识的性质决定的。所谓认识，就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不可能自动地进入人的头脑，而人脑也不可能直接反应客观事物。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使人们有可能认识客观事物。费尔巴哈错误地认为：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的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旧唯物论这种被动的直观的反映论，坚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他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就说明实践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结起来的桥梁，离开实践就无法认识客观事物。

其二，这是由认识的规律决定的。认识的规律表明，认识发源于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感觉，使人们的认识开始发生。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揭示了实践对感觉的决定意义。他说："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

其三，这是由认识的任务决定毛泽东同志强调了感觉的重要，但并不认为，有了感觉，就完成了认识，而是认为，感觉只是认识的开始。他强调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隐藏在事物内部，怎样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呢？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实践一可以积累大量的感觉材料，为抽出本质提供条件；二可以促进事物矛盾运动的发展暴露本质，为认识本质创造前提。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实践是认识事物本质的道路。他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

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

毛泽东同志所充分论证和深刻发挥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原理，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其一，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就阐明了认识的对象问题，这就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通过实践贯彻于认识论。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①。承认了认识来源于实践，也就必然承认了作为实践对象的客观世界。因为离开客观对象的实践是根本不存在的，实践对象和认识对象是统一的。这就不仅使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彻底驳倒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提供了强大武器。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的意义，驳不倒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制服唯心论的唯一法宝就是实践。为什么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是正确的？根据就是实践。正如列宁说的："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②

其二，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就解决了认识的道路问题，这就使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成为唯一正确的科学认识论。唯一正确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主张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旧唯物主义虽然批判了唯心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是由于它不了解社会实践对人的认识的决定作用，所以它的认识论只是一种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结果它既不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78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客观世界，也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阐明新世界观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候，都很自然地从批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开始。

其三，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就论证了认识的能力问题，这就为彻底驳倒不可知论，提供了新的论据。不可知论者，怀疑人类的认识能力。康德说：我们的认识只限于现象世界，但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恩格斯曾以实践的结果驳斥了不可知论。毛泽东同志具体论证了通过实践认识世界本质的道路，为驳倒不可知论作出了新的贡献。他明确指出："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

其四，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就回答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出发点问题，这就为反对主观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主观主义都是把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经验主义只承认自己的直接经验，不接受别人的经验。教条主义则拒绝一切直接经验。王明自称是"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所写的一个十万多字的左倾纲领，流毒全党达十年之久，却没有一条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他制定纲领，不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是"根据国际正确路线的基础"。他"声明"他提的纲领"是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及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揭露说，"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王明左倾领导所以失败，就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基本原理。建国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左倾错误的一个思想根源，同样是由于在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原理中，

存在着主观主义思想。一是对实践含义的解释有片面性，只承认改造世界是实践，忽视考察世界也是实践，助长了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二是对实践形式的解释有随意性，把阶级斗争夸大为“基本实践”，把生产实践误批为“唯生产力论”，把从事其他活动指责为“脱离实践”，引起思想混乱。三是对实践地位的理解有盲目性，使实践离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违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管是否合乎实际，照抄照搬照套，导致唯意志论。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实践论》精神的，必须加以澄清。

二、《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认识的发展过程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论述了人的认识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①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把认识过程概括为两个飞跃：一个是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一个是理性认识能动地回到实践的飞跃。最后概括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

（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毛泽东同志认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阶段构成的。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用感官接触事物，接受事物的刺激，通过神经系统传到大脑，引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起各种感觉，在感觉的基础上，形成对于事物的印象。这个感觉印象的阶段，就是感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的特点，是以具体形象的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是以反映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事物的外部联系为内容。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随着实践的继续，人们把所积累的感觉印象进行抽象、概括、分析、综合，使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产生了概念。继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运用判断进行推理，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就是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的特点，是以抽象思维的形式，间接反映外部世界；是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为内容。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虽然从形式和内容来说，"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同志详细地论证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因为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事物的本质存在于事物的现象之中，并通过事物的现象表现出来。人们只有通过事物的现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离开了感性，理性的东西就没根据，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因此说，"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教条主义者，由于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以为理性不必依赖于感性，重复了哲学史上"唯理论"的错误，结果使革命遭到失败。二是，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因为认识的任务，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的某些真实性反映，但还不是事物本质的反映。人们

只有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发展规律，才能有科学的预见，正确地指导实践，有效地改造世界。感性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它是到达理性的必经阶段。如果否认了感性向理性发展的必要性，满足于感性认识，就不能指导实践，感性认识也就成为无用的东西了。因此说，“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经验主义者，由于否认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以为感性不必上升为理性，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错误，缺乏明确方针，陷入盲目性，往往使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三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相互渗透的。在人的认识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总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是不能绝对地加以区分的。一方面，感性中有理性。人的感觉是包含着理性的感觉，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感觉。另方面，理性中有感性。理性不仅包含感性的内容，而且还要以感性形式的语言或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离开感性的纯粹理性和离开理性的纯粹感性都是不存在的。总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既体现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的统一，也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的统一。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占有十分丰富而且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这是实现飞跃不可缺少的唯物主义前提。如果感性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真实，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理论。我们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错误的认识根源就在这里。为了获得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既要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也要进行考察世界的实践。二是必须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加工，即“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这是实现飞跃不可逾越的辩证途径。只有运用辩证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和全面综合，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三是必须具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这是实现飞跃不可忽视的主体认识能力。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却有能否正确认识之别，原因就是主体能力不同。因此，就要提高认识的主体能力。《实践论》强调要“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党中央号召学哲学、学业务、学科学，理由都在这里。

（二）从理论回到实践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为什么第二个飞跃，比第一个飞跃更重要呢？这是因为：其一，只有第二个飞跃才能检验理论的正误。第一个飞跃得来的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并在实践中补充和发展。其二，只有第二个飞跃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革命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不然就会在前进道路上徘徊摸索，盲目行动。其三，只有第二个飞跃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理论只有回到实践，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却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①

理论回到实践，必须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试点阶段，二

①见《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2页。

是推广阶段。《实践论》中已经充分提供了这个观点的论据。毛泽东同志后来说的，我们的工作总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一切经过试验，就是根据我党长期的实践经验，对这个观点进一步所作的科学概括。

理论回到实践，为什么必须经过试点？其一，实践的客观性要求经过试点。实践符合客观规律，才能胜利。实践所以要求理论指导，就是为了掌握客观规律，避免盲目性。如果理论不符合客观规律，人们在实践中就要失败。因此，实践要求的理论，是必须经过试点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其二，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必须试点。由于人的认识，不但受主观能力和客观过程表现程度的限制，还要受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所以从第一个飞跃中得来的理论，既不可能完全正确，也不可能完全判定是否正确，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和补充修正，然后才能普遍应用于实践。如果盲目地拿未经检验和修正的理论，去应用于大规模实践，固然在认识上也可以收到检验和修正理论的效果，然而，在实践中却往往会造成严重的恶果。只有经过试点，分清理论是非，才能避免用错误理论去指导全局。其三，实现真理的规律性要求必须试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实现真理。而人们接受真理，总是通过一看事实，二听宣传。拿不出事实的宣传，很难使人信服。这也是符合从感性到理性，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的。试点可以起到宣传理论、教育群众、批判错误、创造经验、典型示范等作用。这都说明，理论回到实践，必须经过试点，这是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违反了它，就要多吃苦头。

试点和推广在第二次飞跃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是实践，都要理论指导，都能检验理论，这些是两个阶段的共同

点。但二者又有区别。一是规模不同。试点是小范围试验，推广是大面积实行。二是任务不同。试点主要是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形成正确理论，也可以叫做实践检验理论阶段；推广主要是运用理论，实现理论，创造物质产品，也可以叫做理论指导实践阶段。三是要求不同。指导试点的认识，不论被证明是否正确，都是正常的、有益的；然而，推广却只能推广正确的理论，不能推广错误的理论。总之，试点为推广准备前提和条件，推广是试点的继续和发展。当然，试点和推广都必须在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多年来，我们在试点和推广的实践中，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教训，需要加以总结记取。

（三）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

就某一客观过程来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然而，就客观过程的推移来说，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的最后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段话，用公式来概括就是：实践——认识——实践。实践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终点。这个概括，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也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应当永远遵循的。

三、《实践论》具体发挥了认识的目的的理论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一八四五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接着，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又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①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实践"二字，同以前的哲学、哲学家区别开来，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可见，他们创立新哲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针对主观主义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因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两大任务，就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共产主义者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毛泽东同志对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任务作了全面概括，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必须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改造主观世界，就是“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为什么要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了回答。其一，要自觉担当改造世界的历史责任，必须改造自己。他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要推翻黑暗世界，建立光明世界，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如果不和传统的观念决裂，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自觉担当这个历史责任。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就讲：“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①其二，要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必须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毛泽东同志反复阐明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常常受到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技术条件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必须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和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自己的思想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其三，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也必须改造主观世界。这是因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因此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必须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及时提出新的工作方针，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毛泽东同志强调说：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5页。

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其四，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不改造主观世界，就会使革命遭到失败。在我党十六年的历史中，一些人，由于没有自觉地改造认识能力，没有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教条主义使认识脱离了具体的实践，否认了实践的基础作用，陷入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经验主义，忽视了理论的重要性，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就是普遍真理，违反了认识论的辩证法，重复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有时思想落后于实践，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有时思想超过实践，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都使革命陷入失败。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些血的教训，强调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当前，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目的这个理论，坚持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这个光辉思想，对于克服思想战线上的涣散软弱现象，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自觉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左倾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实践论》运用和发挥了真理的标准的理论

认识的任务就是为了获得真理，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

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就是真理。

怎样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呢？这就是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都没有给以科学的解决。主观唯心论认为主观的认识是真理，客观唯心论认为上帝的旨意是真理，旧唯物论认为众人的公意是真理等等。总之，都是从认识的范围内寻找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的理论，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真理的标准问题。

我党初期，许多人也没有正确地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是把马列主义的本本和国际的指示，作为真理的标准。比如王明，就坚持认为他的左倾纲领“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一直不认错。王明觉得只要认识符合国际决议，就是真理。这种主观标准论，就曾经长期迷惑过党内广大的同志。不解决这个问题，全党思想就不能统一，党就不能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冲破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的高压，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标准的理论，彻底解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武装，在我党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最高权威。他针对长期统治全党的主观主义思潮，旗帜鲜明、坚定有力地向全党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的“只有”，就是表明，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为全党提供了分辩是非的强大思想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他独创性地揭示了实践检验理论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个光辉思想为我们在各项事业中，必须坚持一切经过试验，提供了哲学依据。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真理的本性就是认识符合客观。这个本性就决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能够提供客观根据和物质手段的能力。由于主观认识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提供不出能够证明认识是否符合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根据，所以主观认识不能作为标准。由于客观事物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特点，不能直接去和认识对照，提供不出能够证明自己是否已被正确反映的手段，所以客观事物也不能作为检验的标准。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考察世界的行动。既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能够把认识变成事实，为证实或驳倒认识提供客观根据；又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特点，能够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为证实或驳倒认识提供物质手段。所以，只有实践才能检验。被实践结果证明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算真理，被实践结果证明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就不能算真理。因此，毛泽东同志反复论证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又认为实践标准同样具有辩证性质：它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实践标准所以是绝对的，这是因为，一切认识的是非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凡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符合客观实际的都

是客观真理，对于一切认识，实践或迟或早最终都能作出判断。实践标准之所以又是相对的，这是因为，每一具体阶段的实践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当时的全部认识，一定范围和条件下为实践证明的真理不能保证适用于另一范围和条件，为实践所证实的理论也只是近似的判断，不能做到完美无缺的检验。列宁曾着重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真理的内容都是客观的，所以任何真理都是客观真理。同时又认为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谓真理的绝对性，是指任何真理都是正确的反映了一定的对象在特定条件下的客观内容，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推翻的，因而，它和错误有原则区别，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所谓真理的相对性，是指人们对客观真理的把握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的。在广度上，对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只是认识了它的部分不是全部；在深度上，只能近似地反映，不能穷尽客观事物。因此，承认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也就承认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具有相对性，承认相对真理。所以，任何

---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二者是互相包含的。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没有离开绝对的相对。绝对真理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之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构成绝对真理。人类认识就是从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接近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就会走向绝对主义，把真理变成教条，阻塞了人们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陷入思想僵化；而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就会走向相对主义，抹煞真理与谬误的界限，陷入绝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任务。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全党重新学习《实践论》，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这里着重提出三点：

（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①这正是《实践论》全书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实践论》是我们党确立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因此，认真学习《实践论》，从认识论上加深理解和自觉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行党的思想路线，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做到把思想统一到六中全会的《决议》上，自觉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第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胜利，就发展；违反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失败，受挫折。党的历史上几次发生指导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理论脱离中国革命的实践。建国以来发生的左倾错误，其要害还是脱离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发扬优良传统，避免重犯错误。第三，历史告诉我们，正确指导方针的确立和贯彻，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领导，但"左"的和右的干扰，一直进行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完成了这个斗争任务。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同样会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这个斗争任务，就要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去完成。而一切"左"的或右的错误，在认识根源上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其特征的主观主义。因此，我们应该运用《实践论》这个强大思想武器，从认识论上揭露他们的错误，为坚持六中全会《决议》，排除障碍。第四，建设两个"文明"，是全党的事业，各级干部都要研究新情况，正确解决面临的新问题。因此，都要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充分发挥创造精神，因地制宜的进行工作。我们学习《实践论》，就是为了要自觉坚持实事求

是，反对主观主义。

（二）坚持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同志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起来，为我们党制定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认识方法，这是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决议》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六中全会的《决议》又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都把坚持群众路线和克服官僚主义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由于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所以，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而采取官僚主义的认识方法，就必然产生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学习《实践论》，就是为了掌握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不断地总结和改进我们的领导方法、认识方法、工作作风，注重调查研究，自觉坚持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

（三）坚定党性立场，改造主观世界

学习《实践论》，就要学习《实践论》所深刻阐发和充分体现的坚定的党性立场，自觉改造世界观。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不可能自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其中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毛泽东同志在教条主义的高压下，为什么能够以坚强的政治毅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来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因为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当前，普遍反映，实事求是说到容易做到难，这有一定道理。道理之一就是，这里面不单有认识和方法问题，而且有立场、世界观问题。当然，不懂实事求是，是认识问题；不会实事求是，是方法问题；不敢实事求是，有个态度问题；但不愿实事求是，则是立场问题。立场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掌握不了，也用不好。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在贯彻中所遇到的阻力，有许多就是立场问题。因此，学习《实践论》，首先必须解决立场、世界观问题。第二，没有坚定的党性立场，就会忘记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战斗责任。《实践论》告诉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今天已经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就是共产党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光辉典范。他当年刻苦学哲学，写哲学，讲哲学，就是为了改造党风。现在有些同志，看到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好，工作中有些问题，习惯于摆一堆现象，发一通牢骚，并没有想想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因此，学习《实践论》，应该学出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振奋革命精神，以主

人翁的态度进行工作。第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就不可能带领群众夺取胜利。《实践论》告诉我们，任何过程，“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所以，革命的指导者，不但要善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要善于使自己的认识适应急速变化了的情况，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这就为我们需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当前，很多地方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在思想战线上普遍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胡耀邦同志在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在原则问题上应当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对于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是非问题，每个党员都应当坚持党性，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腐朽庸俗作风，是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相容的。”我们学习《实践论》，就是为了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阐明和贯穿的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性立场，自觉改造思想，不断增强党性。

（贾 文 炳）

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论

——介绍《矛盾论》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它和《实践论》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的标志。《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我们学习《矛盾论》，要抓住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即事物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以便正确地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

《矛盾论》写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这时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已经发生，抗日战争已经正式开始，革命已经转向了新高潮。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已经确立。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经验都证明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

境”①。

《矛盾论》主要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它的特点是只知道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条文，照抄照搬外国的革命经验。正如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说的那样，他们“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又在国民党区秘密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形式和积蓄革命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虽然在严重环境下作过许多英勇的斗争，最后却差不多全部受到了破坏。而由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这样，由红军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运动高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复兴，就被破坏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又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致使被敌人前堵后追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已由第五次反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围剿"前的三十万人减少到不到三万人。若不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就有可能断送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手里。

王明的错误领导虽然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纠正，但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不可能在长征路上彻底清除。因此，在革命脱离了危险而走向新的高潮的年份，为了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毛泽东同志曾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他于一九三五年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系统地阐明了党在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他于一九三六年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他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写了《实践论》，八月写了《矛盾论》，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思想，正确地行动，正确地学习，以无可辩驳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原理，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争论的哲学性质，揭露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的教条主义错误。

一、两种宇宙观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在承认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还必须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万物发展运动的根本规律，否则他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就不能和形而上学划清思想界限。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

列宁说，对于发展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在

历史上常见”的观点：第一、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把事物的“自己运动”忽视了，或者移到事物的外部——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这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种观点把注意力放在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上。这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这种观点才是理解事物“自己运动”的钥匙，是理解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失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①

宇宙观就是对宇宙看法的总观点。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之外，还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观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互相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②

（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正如恩格斯说：“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③这种观点有时也承认自然界有变化，但是那只是外力的推动，数量的增减，场所的变更，现象的重复。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竞

①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页。

争，在原始社会中也有，而且会永远存在下去。在说到社会的发展时，他们就用地理、气候等外部的原因去说明。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也不能解释事物的质变现象。

（三）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这种观点和形而上学相反，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观点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例如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主义的日本变成帝国主义的日本，封建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为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这都不是由于外部的地理气候条件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原因起了主要作用。

但是，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部原因的重要作用，而是“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例如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中国社会因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而变化；两军相争，一胜一败；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胜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以致后来的革命重新发展，又重新遭受打击，等等，都是由于外因影响内因的结果。

辩证法的宇宙观的产生，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产生一样，在古代就有了，不过那是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例如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

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①在中国，古代也有《周易》、《老子》、《庄子》这样具有丰富辩证法思想的著作。到十八、十九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辩证法作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伟大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引起了一次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就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的是教导人们善于观察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的运动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②。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在运动，一切运动都有内在的矛盾。列宁在谈到对立统一法则时也说：自然、社会、精神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③所以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是简单运动形式的基础，也是复杂运动形式的基础。恩格斯说：

①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①在人的思维范围内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就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具体认识过程的有限性的矛盾。列宁讲的：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②，也都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

（二）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就整个宇宙来说，矛盾无处不在。就一个具体事物来说，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矛盾无时不在。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例如德波林等人就认为事物在开始发展时只有差异而无矛盾，矛盾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在他们看来，法国在革命前的第三等级中，在劳资之间，在工农之间，只有差异而无矛盾。其实他们不了解差异本身就有矛盾。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就是旧的统一和对立让位于新的统一和对立，新过程代替了旧过程，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了新的矛盾发展史。

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模范的分析。他从分析最普遍最常见的商品交换中的矛盾开始，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及其矛盾的胚芽，往后又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列宁说："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③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②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

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正确地推断革命的将来。这个叙述、研究的方法，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

三、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我们要认识具体事物的特点，就必须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

（一）要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

"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我们在研究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时，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这种情形，不但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同样地存在着。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但是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经历着"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

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了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也不懂得在认识了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他们拒绝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当作凭空出现的公式，颠倒了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不懂得两个认识过程的互相联结，因此也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二）还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每一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特殊性

“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共产党内的思想矛盾；社会和自然的矛盾；都是不同质的矛盾，都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旧过程和旧矛盾解决了，新过程新矛盾发生了，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例如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方法，都是性质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到处套用一种公式，结果使革命遭受挫折，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三）还要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

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一个大的事

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互相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所谓最本质的东西，也是最要紧的东西；所谓活的灵魂，就是主宰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东西，因为没有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产生，产生了也会变成僵死的东西。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所以他们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四）还要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本质，非到过程完结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形又往往是互相区别的。这是因为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而被根本矛盾规定、影响的其他大小矛盾，有些激化了，有些解决了，有些缓和了，有些又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阶段性，就不能适当地处理矛盾。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显出了事物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虽然各自的根本

矛盾没有改变，但是它都逐渐激化了。由于根本矛盾的逐渐激化，规定或影响了其他各种矛盾的新变化，从而就显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质的阶段性。

（五）还要研究事物发展各阶段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各个方面也都有其特殊性。因此研究问题，必须研究各个阶段中矛盾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例如国共两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变化特点。在国民党方面，一九二七年前它是一个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革命党，一九二七年后变到了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又被迫开始停止内战，转到联共抗日这方面来。在共产党方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虽然领导了第一次统一战线，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党内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后，党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但是党内又出现了左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受到了很大损失。自一九三五年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这些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成了具有丰富经验的党。我们在研究这两党不同历史阶段的种种特点时，“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对立。”否则我们就不能了解两党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的相互关系。

（六）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我们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必须从物质的运动形式、各个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各个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

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个方面中去研究。“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由于事物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发展是无限的，所以在一定的场合之下的矛盾普遍性可以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之下的矛盾特殊性也可以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普遍性的矛盾，而在整个阶级社会则又成了特殊性的矛盾。然而马克思把这个特殊矛盾解剖出来之后，就更充分、更完全地把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普遍矛盾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相联结的，事物内部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例如斯大林在分析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时，不仅分析了它产生的国际根源，而且分析了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这样，斯大林就分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普遍性，说明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矛盾的特殊性，说明了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斯大林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七）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然而这种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矛盾的各个特殊性，造成了个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矛盾的普遍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矛盾的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称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就是因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离的，看不到它们的相互联系，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不懂得辩证法。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只是强调矛盾的一个方面的重要，而否认了两个方面的互相联系，所以他们丢掉了矛盾的精髓，抛弃了辩证法。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也是矛盾的特殊性。由于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所以毛泽东同志把它单独提出来加以分析。

（一）主要的矛盾

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所谓主要的矛盾，就是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社会的其他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所影响。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同时存在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阶级这

两个主要矛盾。但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告诉我们的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由于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二）主要的矛盾方面

我们在研究矛盾所处的地位作用时，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同时也不能把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平均看待。因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所以造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三）矛盾的主次地位是互相转化的

矛盾的主次地位不是固定的，是互相转化的。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也是互相转化的。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地位转化了，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这方面，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在“新陈代谢”中，新的东西从被支配的地位转化到支配地位以后，新事物就代替了旧事物；资本主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封建的附庸地位转化到主要地位以后，封建的社会性质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民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经过民主革

命，转化到统治地位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变成了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在革命斗争中，顺利条件战胜了困难条件，革命就由困难转化成为顺利；在学习中，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都说明了矛盾主次方面的地位转化，同时也说明了由于矛盾主次方面的地位转化，引起了事物性质的变化。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样说并不是违反了唯物论，而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个“一定条件之下”很重要，也就是说它们的反作用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离开了“一定条件”，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就不可能互相转化。第二，我们在承认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时，是在“承认总的历史发

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的前提下承认的，而不是离开这种物质前提片面孤立地夸大它们的反作用。第三，那么为什么说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呢？这只是说明矛盾双方的作用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说生产关系可以离开生产力、理论可以离开实践、上层建筑可以离开经济基础而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总之，我们要把握这个问题的本来含义，不要片面歪曲地理解了。

我们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就不能提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它是深入矛盾内部研究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问题。是人们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矛盾的同一性

所谓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

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①

对列宁的这段话，可以从以下三层意思来理解。

第一、矛盾的双方是怎样能够同一的？

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就是互相排斥、斗争、对立的。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怎样又说是同一呢？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是孤立地存在。假若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所以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

第二、矛盾的双方是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同一、互相转化的？

矛盾不是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因为没有同一性就不会相互转化。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阶级；起过积极作用的国民党经过帝国主义的引诱和他固有的阶级性转化为反革命，又经过共产党的斗争转化为被迫抗日；失掉土地的农民经过土地革命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民；现在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的无产阶级专政将来转化到取消这种专政；现在的共产党转化为将来消灭一切政党；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都说明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互相转化，这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列宁说在什么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

因为客观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一切矛盾本来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转化本来就是有条件的，生动的，变动的，所以人们的头脑就应当如实地反映它。如实地反映它，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反之就是形而上学。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革命转化。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矛盾和矛盾的转化是现实的、具体的，不是幻想的、臆造的。神话和童话中讲的那些矛盾变化，例如“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孙悟空七十二变，鬼狐变人等等，是无数现实矛盾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想象变化，它不等于现实的矛盾转化。现实的矛盾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是有具体的同一性的。例如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石头就不能转化成鸡子；战争与和平能转化，战争与石头就不能转化；人能生人，人不能生出别的异物；俄国的二月革命能够转化为十月革命，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有这种转化，还有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也没有实现这种转化。所有这些，“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

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也就不可能实现矛盾的转化。

（二）关于矛盾的斗争性

什么是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在矛盾斗争性问题上需要弄清的两个问题。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一是相对静止的状态；二是显著的变动状态。运动的静止状态，是处于量变之中，没有根本的性质变化，所以好似静止的样子。运动的第二种状态，是事物处于质变之中，所以有了显著地变化。事物的运动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并且经过质变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任何矛盾都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相反相成”这句话，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因此，我们在讲同一性时，不要忘记了斗争性；在讲斗争性时，不要忘记了同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一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为条件而存在，互为条件而发展，互为条件而转化的。只有斗争性而无同一性，矛盾的双方就成了毫无联系的东西，矛盾就无法构成，斗争就无从产生；只有同一性而无斗争性，那也不能成为矛盾，同一也就成了僵死的同一。所以说同一性和斗争性缺一不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也是矛盾的普遍和特殊性的关系。“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一）什么是对抗

在矛盾的斗争性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例如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对抗，两个对立着的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双方就采取了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社会革命。在自然界中也有与这种外部冲突形式相仿佛的情形，就象炸弹未爆炸时，内部的矛盾物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待到发火就出现爆炸。

认识这种矛盾的对抗形式很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

（二）对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

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当应将对抗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

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共产党内的思想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例如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思想矛盾，我们党内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的思想矛盾，都是以后发展为对抗的了。再如城乡之间的经济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抗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对抗的，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城乡差别的消灭，这种矛盾也就自然消失了。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①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所以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根据多年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在学习和掌握《矛盾论》的辩证法思想时，有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这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矛盾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毛泽东同志说："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处理不好这两者的关系，就势必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讲，实际都是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例如"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义主'。

①见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评注。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①而教条主义则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而否认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其实他们都是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基础，共性是个性的共性。共性来源于个性，又反过来指导人们认识个性。“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人类的这个认识秩序，就是一个由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再到认识矛盾的特殊性的过程，如果割裂了这个认识过程，也就是割裂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关系。

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我们多年来出的问题是：第一，忽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例如搞社会主义建设，不重视研究中国的经济特点，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积累，急于求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还有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唯上”、“唯书”、“照抄照转照搬”，工作方法上的“一刀切”等等，实际也是教条主义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表现形式。第二，把矛盾的特殊性夸大为矛盾的普遍性。例如在推广先进经验的问题上，把先进单位的某些具体经验，当作普遍适用的东西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广泛推行，这对照搬别人经验的单位来说，也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第三，只讲矛盾的斗争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认为讲斗争就是“革命”，就是“辩证法”；讲同一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调和矛盾”，实际上割裂了对立统一的规律，也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二）处理好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关系

这是矛盾特殊性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党决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很重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时说：“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①恩格斯说：“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②列宁说：“你要抓住整个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不等于说非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不重要，也不等于解决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其他的矛盾或矛盾的方面都能够自然解决了。事实上只抓主要矛盾，不抓次要矛盾，不但有些次要矛盾解决不了，而且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例如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

在矛盾的主次地位关系问题上，我们多年来出的问题是：第一，主观主义的确定主要矛盾。例如党的“八大”决议提出的主要矛盾，本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十年之后，又批它是“唯生产力”的理论。第二，过分地强调了理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的作用，而忽视了实践、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根本决定作用，其结果颠倒了实践与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正常关系，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唯意志论”、“穷过渡”等等不应有的东西。第三，否认矛盾的主次地位转化，把主要矛盾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到共产主义就不能停止，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记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把矛盾的主次地位平均看待；也不能只顾主要，不顾次要；更不能只看次要，不看主要，要及时看到矛盾主次地位的发展转化，否则就要犯“左”的、右的或者均衡论的错误。

（三）处理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研究矛盾之中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深入展开。“所谓了解矛盾的各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同一性是对立存在的条件，如果没有同一性，对立就无法存在，斗争就无从开始，矛盾也就无法构成；如果没有对立斗争，矛盾的统一体就会永远停止不动。“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恩格斯说：“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①列宁说：“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②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也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因此我们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上，不能只持一端，只强调一个方面的重要，而忽视甚至否定另一个方面的重要。

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发生的问题是：第一，只讲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否定矛盾的同一性，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简单地归结为“斗争哲学”，因而贬低、否定了矛盾同一的重要作用。第二，把矛盾的对抗看成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式。例如一讲社会矛盾就是阶级斗争；一讲党内矛盾，就是路线斗争；一讲思想矛盾就是两个阶级的两种思想斗争。同时在讲这些矛盾的时候，也不看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一律用批判斗争的形式去解决。其结果不但破坏了客观事物的统一体，而且也破坏了客观事物发展的正常的矛盾关系。因此，我们在讲斗争性的时候，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同一和联系；我们在讲同一性的时候，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我们采取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时，一定要区分矛盾的性质，否则我们就要犯主观主义、片面性的错误。

学习《矛盾论》，就是为了反对形而上学，坚持唯物辩证法，从而达到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目的。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讲话中说：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左倾错误方向，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逐步确立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但是继续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还是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涣散，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都要求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我们要善于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既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又要防止右的倾向，从而做到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好。

（薛根治）

分析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介绍《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五月写的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一部充满着丰富哲学思想的哲学著作。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战场上。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著作中，阐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指明了游击战争的发展道路，有力地驳斥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成为指导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在国民党战场，由于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在敌人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在华北方面，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军就连失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接着上海、南京失陷，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相反，在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在华北方面，我八路军所辖的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开赴形势危急的华北战场作战，并先后在晋察冀、

晋冀豫、晋绥、山东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反对，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在华中方面，我新四军于一九三八年春进入华中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钳制敌人向华中内地进犯。这样，华北、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形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敌后战场。仅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就四十万，伪军七万八千余人，有力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打击了日寇的进攻。

但是，就在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当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它害怕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竭力限制和削弱革命力量，对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行恶毒诬蔑和攻击。国民党不相信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特别寄托在英美对日的干涉上，由英美代它抗日。二是我党许多人对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意义认识不清，对其前途持怀疑态度。他们看到国民党数十万久经训练的正规军，都不能支持华北的战局，在日寇进攻面前不堪一击，难道装备很差的游击队还能与日寇作战并取得胜利吗？认为游击战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规战。这种思想当时以王明为主要代表。

为了领导抗日争取胜利，我党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配合）；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我党我

军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洛川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针对党内当时对游击战与运动战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看法的情况，多次解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已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①接着在九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九，毛泽东同志还强调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可是，平型关战役之后即十月八日，华北军分会对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中又提出实行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要求我军配合国民党军打正规战，仍强调打运动战。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于十月十三日给华北军事首长的电文中指出：华北的正规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就是游击战。这说明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华北军分会的决定。这是洛川会议前后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争论的情况。

在王明回国之前，党内对游击战的看法就有分歧，王明回国之后，更是直接地公开地否定洛川会议，反对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国民党军求得速胜，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种主张配合国民党打正规战，打大仗的错误方针，正中了国民党利用抗战限制、削弱和消灭我党我军的阴谋。十分明显，要不要开展游击战争，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

①引自1981年7月7日《人民日报》。

略方针，不仅是我党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党内斗争在军事上突出的集中表现。它关系到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着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正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从分析矛盾特殊性中，认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的时候，根据研究战争要始终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从矛盾普遍性中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道理，从观察、分析中日的各种矛盾出发，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地位。

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争。既然如此，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呢？

毛泽东同志从两个方面作了回答。从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看：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大而弱的国家受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强敌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在占领区不能不留下好多空虚，给我开展游击战争造成有利条件，并且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从时间、地域和性质诸方面的特点看：中日战争作为一个统一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由于敌人对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所以是孤立寡助的，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

参助的，特别是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加之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黑了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样就使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综合上面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决定了游击队不仅要担负起作战的任务，还要担负起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抗日政权和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等战略任务，于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进攻，建立根据地，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而所有这些问题远远地超出了战术的范围，这就是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到战略地位上加以考察的理由所在。

在阐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之后，毛泽东同志进而运用同一中有着差别的原理，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同正规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在战略问题上的一致性和区别点。强调“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决不能把正规战的战略问题的一般东西，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这样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范例。

二、从矛盾的普遍联系中确立实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既然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呢？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战争的指导规律，正确地指出，要实现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必须处理好下面几个关系：

（一）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运用全局与局部、长远与暂时的辩证法原理，论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两军相杀的中日战争，自然必须坚持贯彻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是为基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即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反映在军队的行动上，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在这里，“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提倡勇敢牺牲的精神。这与保存自己表面看来是相矛盾的，其实是相反相成的。因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如果借口保存自己，不愿为整体和全局的胜利付出必要的牺牲，那是极大的错误。当然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反对蛮干所造成的无谓牺牲。

（二）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的关系

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由敌我双方的特点决定的，它是改变敌我形势的有效手段。毛泽东同志指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

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中心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主要保证。

所谓主动性，就是驾驭战争的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由权。它对战争的胜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是因为，谁取得了主动权，谁就有了赢得战争胜利的把握，反过来谁失掉了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位，谁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这种战争主动权的问题，既是任何战争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抗日游击战争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和不统一的状态等。这样说来，是不是抗日游击战争毫无主动权的客观基础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这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放手争取广大活动地区；欺他异国作战，放手争取千百万群众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这样游击队的主动权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弱点也可以在战斗中逐步减少。

所谓灵活性，就是主动性在作战中的具体实现，即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同志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①"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1页。

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这种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毛泽东同志说，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应该象渔人打网那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掌握分散、集中、变换三个使用兵力的方法就可取得用兵的灵活性。

战争的计划性，就是战争的战略、战役、战斗具体实施方案。古人说“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充分说明了计划性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是不能获得战争胜利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所干的。我们提倡每一个游击战争的指挥者都能成为智勇双全的英雄，既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又有驾驭战争变化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关于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观点是统一不可分割的，都围绕于战役战斗的进攻这个中心。在这里，主动性是中心，是目的，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实现战争的基本原则。但要实现主动性，必须以计划性为基础，因为只有事先有了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才会有作战行动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才能实现进攻。所以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离不开计划性的，而计划性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对上述情况的调查了解，虚心研究，必然产生两种错误的倾向：要么因悲观

的估计而消极处置，要么因乐观的估计而冒险处置，其结果不仅谈不上什么主动性、灵活性，相反，只能是被动挨打甚至被敌所消灭。由此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制定计划的前提条件，也是取得主动权的基础。离开对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和估计的主动性是盲目的主动性，这种盲目的主动性越大，丧失主动权的危险就越大，所以必须坚决反对。至于灵活性，毛泽东同志回答说："灵活不是妄动，……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①这就是说，灵活性同样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只有依靠"审时度势"，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达到"运用之妙"。总之，主动性、灵活性以计划性为基础，计划性又以对客观实际的调查了解为前提，而主动性又通过灵活性表现出来。三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三）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关系是什么？毛泽东同志依据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和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道理指出：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决定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有其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所谓辅助正规战，从整个游击战争来说，它突出的任务就是配合正面战场的主力兵团作战，配合野战军进行重点防御和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这种配合具体地讲，有战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战役、战斗三种情况。战略配合，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在具体行动上，广泛地实行袭击战、偷袭战，爆炸敌人的仓库、桥梁，袭击敌人的指挥机关、特种武器阵地、机场、雷达、通讯枢纽等，要灵活地打击敌人后方的重要目标，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方，使其不得安宁，造成敌人神经紧张，慌恐沮丧，不但不能集中全力于正面战场，还得从正面战场抽掉部队来后方应付游击队。战役上的配合，主要是当我主力兵团举行某个战役时，游击队在一定的方向上，或者战役的邻近地区，以配合战役为目的，积极开展各种战斗活动，或者完成某项特定任务，使敌军不能顺利地集中全力与我主力作战，或者通过破坏交通，阻止敌人前进，或者向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进攻，以保证我军作战之胜利。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就减少了战略配合的意义。”战斗上的配合，就是战场作战的配合，这种配合，常常是游击队根据正规军指挥员的指示，或根据具体情况，担负起钳制，侦察，破坏交通，通信，充当向导等任务。

游击战对正规战的上述三种配合，清楚地说明了游击战虽然处于辅助地位，但却是完全不可缺少的。毛泽东同志在评价东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时说：“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人，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所以游击战的领导者，必须从战略任务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积极主动地配合正规战。

游击战不仅要配合正规战，而且必须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必要和可能是由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游击队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担负解决战争命运的战略任务。同时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也能够使游击队经过战争的锻炼，逐步转变为正规部队，其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变为运动战。但是，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必须具备扩大数量和提高质量两个条件，否则是不行的。扩大数量，除直接动员群众加入部队外，还可以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把游击队逐步升级为正规部队。提高质量主要是通过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方面的加强和改进来实现。这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不然就不能进行歼灭战，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终战胜敌人。

（四）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关系

抗日战争中，为什么要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如果没有这个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游击战的领导者必须清除流寇主义的思想，充分认识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只有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既然根据地的建立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需要什么条件？怎样处理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根据事物之间相反相成的道理，明确指出：游

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有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三种。山地地势复杂，凭险可守，易于隐蔽，便于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并能限制敌人兵力的展开和装备的使用。所以建立山地根据地，就成了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和重要的堡垒。平原根据地，虽较山地差些，但因敌人兵力不足，只能占领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和某些平地，又执行着极端野蛮的政策，我们则地大、人多、兵多，只要政策正确，指挥适当，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完全是可以的。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一般比平原要好，却次于山地。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对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认识不够，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缺少这一方面无异于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即时地补充之。上述三种根据地建立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必然受到来自敌人的破坏，这样，一个要建立，一个要破坏，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的原理指出：建立根据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就是武装部队的问题"，只有建立强大的武装部队，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开辟和保卫根据地。没有这个条件一切无从谈起；第二"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兵去战胜敌人"。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使敌占区变为游击队的根据地，才能使游击队的根据地不被敌人所控制；第三"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只有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才能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不被敌人所打破。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建立了武装部队，就能战胜敌人，而战胜了敌人则利于发动群众，反过来发动了群众，就能使武装部队得到

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补充，就是对武装部队的加强。可见在这三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主要的。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用全部精力建立一支以至多支游击部队，并使之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仅要重视根据地的建立，还必须担负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责任。为什么？因为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敌人的后方，一般地都存在着敌占区、根据地和游击区三种情况，游击战争只有向根据地四周扩展，把敌人围困在少数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不断地消灭敌人，摧毁伪政权，发动组织民众成立抗日团体，建立抗日政权，威胁敌之生存，动摇其军心，才能巩固发展根据地。否则根据地不仅不能巩固扩大和发展，而且弄的不好，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占区的可能也会发生。在谈到巩固根据地和发展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根据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前进，不是直线式的上升的原理提出了发展和巩固相结合的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他说：根据地的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须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机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至于什么时候应着重巩固，什么时候应着重发展，这要依照实际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巩固和发展的这种辩证关系，是事物发展不平衡的体现。不分主次或者把巩固和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违背辩

证法的。

（五）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关系

在防御与进攻的关系上，从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是主要的。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对于掌握战斗的主动权，从根本上决定战争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防御是消灭敌人的辅助手段，它从属于进攻并为进攻服务的。但是，当劣势军队遭到优势军队的进攻，从根本上危机军力的保存时，通过防御以保存自己，以便创造条件待机破敌，就十分重要了。所以正确实施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配合正规战向运动战发展，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之一。而要正确地实施战略进攻和防御，只有根据不同的敌我情况来规定。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防御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战略进攻则是敌取守势我处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方针。依此出发，毛泽东同志又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阐明了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他说：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和敌之战略保守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敌人为了进攻或者为了保守其占领地，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有防，没有攻呢？不是的。

防御和进攻是相辅相成的。防御中有进攻。（1）当敌对我根据地采取分进合击时，我可采取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利用战役、战斗袭击战法（主要是伏击战）在敌行动中打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另一路，各个击破敌之围剿。（2）当敌人还没有停止

进攻或实行退却，并侵占根据地内一些城镇时，我应围困这些据点，断其粮源和交通联系，迫其后撤，待其撤退时乘机追击。(3)当围攻之敌在我根据地内久踞不走，我可以一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而用主力于外线，进攻来犯之敌的老巢，调动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这种防中有攻的战法，是真正的防御，因为防御不仅是为了保存自己，也是为了消灭敌人，而只有消灭或者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才能为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达到更好地保存自己的目的。

同样，进攻中也有防御。当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敌我力量对比未发生根本变化，敌对根据地的进攻，一般是不会停止的。所以应充分利用战略进攻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发动群众补充、训练和扩大部队，解决给养和被服问题，另一方面，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作战，把战略进攻与反围攻的准备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有计划、有准备地打破敌人的新围攻。在这里，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千万不能因我之战略进攻得意忘形，轻敌麻痹，必须善于观看敌人的方向，看其有否向我进攻之征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应地结束我之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之进攻。这就是攻中有防。所以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必然会出现的防御，在组织防御时又要想到下一步的反攻和进攻，它们相互渗透，彼此交错。任何割裂进攻和防御的形而上学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只攻不防，是军事冒险主义；只防不攻，是军事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都要坚决反对。

（六）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这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指挥方法。正确地处理游击战争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与正规战争相比，游击战争本身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进攻性更大，而且多取袭击的形式；二是战斗的速决性要求更高；三是包围敌人的外线圈要小，要小口小吃，集小胜为大胜。游击战这些特点，要求游击战的指挥者，不应当对游击战如同正规战那样实行高度的集中和统一。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例如游击战争对正规战的配合；在一个游击区或根据地内，存在着主力游击兵团，辅助游击部队，不脱产的广大人民武装，则需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也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是，"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

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这就是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

在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问题上，还包括处理好地方和军队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地方主义来源于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他们只顾地方利益，忘记全局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活动。同地方主义相反，单纯军事主义来源于主力部队，他们只顾扩充自己不愿扶助地方武装，不懂得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不是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发展游击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同样，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也必须克服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

总之，“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

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特别突出的光辉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由权，能否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对于战争的胜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战争的主动权，绝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也不是坐等得来的，而

是来自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情况的了解，没有这个条件，主动权是根本谈不到的。抗日战争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只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弄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压倒敌人而破之，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知己知彼”，从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有个争取主动权的问题，经济建设同其他一切事业，同样也有个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在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作十分主动。为什么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段，却多次跌跤，多次碰钉子？究其原因，除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之外，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我们对于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是在认识掌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来规定我们的计划和目的，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似乎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性，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讲的主动性。我们讲主动性，必须使认识符合实际，这样，才有真正的主动性。多年来，我们之所以没有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就是主观认识离开了我国的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失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权，弄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发展缓慢。

建国三十二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权，首先要求我们要面向中国的实际，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经常不断地把我们的主观设想和客观实际、

群众实践相对照，使其不一致的达到一致，这样，我们就能够日益深入和具体地把握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预见，减少主观设想中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成分，从而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权。相反，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不是放在对中国实际认识的基础上，而单纯放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上，或者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那么，不管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多么强烈，意志多么坚强，决心多么大也难免要遭到失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以此作为我们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权，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

（刘德明）

实事求是的光辉篇章

——介绍《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进行了十个月的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著作，也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通篇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它所包含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具有普遍意义。

当时，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按其既定的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的"大陆政策"，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又借口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大规模的新的侵华战争。并依仗其优势军力，妄图采取战略上的速决，一举灭亡中国。在敌人进攻面前，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面抗战。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也被迫于七月十七日宣布对日抵抗，于是中国人民八年英勇抗战便从此开始了。

在抗日战争进行的头十个月里，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采取消极单纯防御的方针，加之国民党军队的极度腐败，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局面而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仅仅十个月的时间，就丢失了北平、天津、华北大部地区和上海、南京、徐州，随之，日寇又直逼武

汉、广州等地；在敌人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解放区战场，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拖住了其全面进攻的后腿，迫使日寇由主要对付国民党的军队转而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我们进行持久战。这种形势，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同反映：国民党集团内部充满着失败的情绪。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抗战前就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这时又说“再战必亡”，亡国论甚嚣尘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迫于人民的压力和自身及其主子的利益，是被迫勉强抗日的，他们一方面时刻准备向日本妥协、投降，一方面又幻想依靠英美援助，不费力气地很快打败日本，害怕人民起来抗战，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而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我们党内，由于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①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员，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忘记了国民党反动、腐朽的一面，幻想依靠国民党的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速胜，不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在军事上，轻视游击战，要我军“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同时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得一打，看不到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从全国来说，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在各阶层的群众中都有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

定的影响，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认识和了解。

"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鼓舞和坚定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础上，集中了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军指战员的集体智慧，及时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重要讲演，详细正确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头十个月的经验，深刻地分析揭示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预见了这场战争的进程，明确规定了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从而指明了抗战的道路、方法和前途，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为中国人民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起到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八年抗战的实践，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结论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处处闪耀着活生生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我们应当把这部著作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来认真学习，以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克服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指导，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论持久战》全文共二十一个问题（一百二十节），分

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九个问题（一至五十八节），“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着重分析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第二部分，后十二个问题（五十九节至一百二十节），“是研究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着重阐明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及其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和具体运用问题。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毛泽东同志在研究分析中日战争时，牢牢抓住了辩证法这条基本规律，把中日战争的总体，分解为互相矛盾着的两个部分，实事求是地、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的特点，从这些特点的对比发展变化中，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见到中日战争必须经过三个阶段，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这个基本结论和科学预见的得出以及它所具有的不可辩驳的力量，正是唯物辩证法原理的精辟运用和生动体现。

（一）从分析中日战争这一矛盾的特殊性入手，揭示出矛盾双方的基本特点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首先着眼于中日战争这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688页。

一矛盾的特殊性，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里就认清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只有把中日战争放在一定时代条件下进行考察，才能了解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把握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是孤立的，是受这个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的，这是中日战争的本质所在；指明了战争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背向，这是日本必败的主要根据；概括了交战双方最基本的特点，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对一个大而弱的国家，集中显示了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规定了它与其他任何战争区别的特殊矛盾。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这就是中日战争发生发展变化的全部根据。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②“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③为了进一步暴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露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和规律，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的科学方法，从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性质和中国、日本、国际等方面，实事求是地着力抓住存在于中日双方，贯穿于战争过程始终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自然地理诸条件的总和，详尽地分析研究了矛盾的每一个方面，既抓住了构成战争的最基本的特点，又看到了构成该战争的其他条件；既敢承认敌人的长处，又要看到敌人的短处；既敢承认自己的短处，更要明确自己的长处；既指出了已经出现的要素，又估计到以后必然出现的要素。通过这种分析与综合，具体概括了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全部基本要素，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在这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特点中，日本只有一个长处，即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较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规定了日本侵略者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有三个短处，即战争性质的退步性和野蛮性，这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日本国度小，其人力、物力、军力、财力等均感不足，决定了它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国际上的寡助，必然遭到世界上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中国只有一个短处，即中国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只能持久，不能速胜。有三个长处，即战争性质的进步性正义性，必然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各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抗日战争必胜的主要根据；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兵多、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必然获得国际上的广大援助。这些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了战争的进程和结

局，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之中，并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抗日战争就是中日双方这些特点的比赛。毛泽东同志从这些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和相互排斥、互相转化的发展中，全面观察、纵横对比，判明了事物的性质及其总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中日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日本虽强，但处于帝国主义没落时期，且受其弱点所制约，这种强是表面的暂时的；中国虽弱，但它包含着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军队，还有党领导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和已经觉醒或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这些都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其本质是强大的，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因此，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争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从而放射出真理的光辉。

（二）从事物矛盾的量变与质变运动发展过程中，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而矛盾的运动发展是循着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规律进行的。“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中日双方矛盾的全部要素。不是僵死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变的，是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正是这些发展变化，才使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阶段性来。毛泽东同志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的分析，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体现，并创造性地提出“旧的量与质”和“新的量与质”、“向下的变化”和“向上的变化”这样的科学概念，为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增加了新的颗粒。从而具体揭示了抗日战争所必然经过的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战略进攻的相持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并详细地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但是这种优劣形势随着战争的推移，敌我双方的力量都有“向下”和“向上”的两种变化。我之向下的变化，主要是土地、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文化机关的减缩等，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这一点将被利用为亡国论或妥协论的根据；向上的变化，则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和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游击战争的出现和国际援助的增长等，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这是我们能够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根据。敌之方面向上的变化，是领土、人口和资源的扩大等，主要表现在量上，是暂时的局部的；但敌之向下的变化，则表现在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给养的消耗，士气低落，人心不满，国际舆论谴责，贸易缩减等，因敌之特点所决定，其向下的变化是必然的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质上。因此，敌我优劣形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敌之向下和我之向上的变化，均随着战争的延长和我们的努力而发展，必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原来程度。第一阶段，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相当悬

殊，我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只能采取战略防御，这是质的规定性。但已经发生了若干量变和部分质变，因而才能转入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中日双方将按照第一阶段的情形继续变化发展，中国将逐渐上升，脱出劣势；日本将逐渐下降，脱出优势。经过较长时间的较量、争夺的艰苦奋战，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向优劣相反的地位，大体上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这一阶段，虽然有部分质变，但从中日战争矛盾的总体上看，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而且进展相当缓慢，战争极为残酷，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优劣形势的枢纽。

第三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中国将依靠自己力量的增长和国际援助，进入和完成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同志并预见到，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此阶段的前期反攻，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态势。八年抗战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和战争形态的预见十分精确。

纵观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是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部分质变，又从部分质变达到根本质变。如果没有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就不会有相持阶段的到来；如果没有相持阶段的充分准备，就不可能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没有战略反攻，矛盾也不会发生根本质变。可以说，上一阶段是下一阶段的前提和准备；下一阶段又是上一阶段的趋势和归宿。毛泽东同志基于对中日战争内部矛盾质量互变规律的分析，科学地揭

示和预见到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这一中日战争的必然进程和趋势，这就是战争中优劣形势之间质量互变规律的辩证法。并且正确地指出，中日战争不仅在时间上表现为三个阶段，而且在空间上表现为犬牙交错的不平衡形态。他高度赞扬："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日战争对世界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批驳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研究中日战争规律的同时，批驳了抗日战争时期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同样一个抗日战争，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除政治立场外，主要是看问题的方法即认识路线不同，归根到底，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亡国论和速胜论在认识论的根源上都是唯心论和机械论。亡国论者只见到敌之长处，我之短处，即敌强我弱这一矛盾，并把它夸大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看不到强弱之外还有其他矛盾相制约；速胜论者则相反，只看到我之长处敌之短处，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一事实，或把中国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或把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当成全体。这两种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不能全面地、客观地认识战争内部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因而是主观的、片面的。这就脱离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使认识成为臆想的东西，所以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同时没有把中日双方全部要素看

成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发展变化的，而是孤立、静止地考察问题，因而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①。"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②认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首先取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有从实际出发，分析研究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实"，探求其内在联系的"是"，才能揭示并把握其特殊的本质。毛泽东同志对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揭示和科学预见，既不是靠主观想象、头脑里固有的模式、偶然的巧合，也不是靠书本上现成的条文、对客观现象的直观罗列，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从敌我内部矛盾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中，分析了它的主要和次要、本质和现象、绝对和相对、长远和暂时等辩证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比如，敌强我弱这个要素，规定了日本能在中国有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要走一段艰苦的路程，战争是持久的，不能速胜；但敌强我弱不是孤立的，是同后三个基本要素并存的，并受其牵制的。敌强我弱是相对的。敌之强受其弱点所制约，强中有弱。我之弱又赖于其优点以弥补，弱中有强。在战争中，我将努力扩大敌之不可克服的缺点，发挥我之必然不断扩大的优点，这就决定了日本不能在中国横行到底，中国不会灭亡，必然胜利。这里充满了辩证法，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二、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行战争，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认识中日战争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为了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研究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之后，接着又阐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这就是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

（一）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上，精辟地论述了自觉能动性及其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简言之，这种自觉能动性，是讲从事战争的人认识战争规律和进行战争的自觉活动和努力，它包括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客观条件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物质基础。因此毛泽东同志总是突出强调战争指挥员，不要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他们的活动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上，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要求战争的胜利。这里关键是要做到主观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要求指挥员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做到“知彼知己”，特别要善于对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经验教训进行概括和总结，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行动。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发表时，抗日战争进行将近一年，也就有可能在规定持久战这一总的战略方针之后，对实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做出规定。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条件，还决定于主观的努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的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在具备了胜利的客观条件下，主观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主观指导，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充分发挥战争指挥艺术，掌握战争主动权，凭借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有着不同的特点，自然规律是自发的发生作用，而社会规律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战争与和平状态下社会运动又具有特殊性，战争双方都是成群武装的活人，其斗争方式极端残酷激烈，是智慧、勇气和力量的竞赛，这种自觉能动性就特别强烈地表现于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没有正确

的战争指导路线和方针，没有正确的行动实施战争，就不能坚持持久战，更不能能动地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论述，不仅没有违反唯物论，而是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对待自觉能动性问题上，必须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条件论，只片面地强调客观条件，而忽视主观努力，本来能够办到的事情也不去办；另一种是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种自觉能动性"。

（二）把辩证法运用于战略战术的各个环节，具体论证了战争指导者的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双方对立的全部要素，提出了实行持久战这个抗日战争的总方针，又基于对战争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和认识，制定了实现持久战所应采取的具体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原则，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深刻哲理的论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特点，从"战争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原理出发，为我军制定的"战略上内线持久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进攻战"之辩证统一的具体战略方针，贯彻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总目的，充分体现了战争中的能动作用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以劣抗优、以弱胜强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是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辩证法看来，许多似乎是对立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是能够统一的，而

统一和联系又是生动的、活跃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战争中的敌我双方，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内线和外线，持久和速决，进攻和防御等等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是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是对立统一的。日本进攻中国，战略上处于外线进攻的主动地位，我则处于战略内线防御的不利态势。但日本以少兵临大国，不可能占据它所达到的一切地方，只能占据某些点和线，因此，我可利用地广、兵多两个长处，不打死守阵地的防御战，在战略防御中，实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采取灵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几路对它一路，使之处于我军包围之中，改变其战略上外线进攻的主动地位为战役、战斗上内线防御的被动地位，而我则从战略的不利态势中争取了战役、战斗的有利态势。敌人依仗其优势的军力、经济力，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实现战略上的速决，而我不与它硬拚硬顶，利用地广这个空间与它周旋，使之战略速决企图实现不了，被迫与我打持久战。同时我在战役、战斗上一般不打死守的阵地战，也不打驻止之敌，而打运动之敌，乘敌运动之际，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聚而歼之，迅速解决战斗，使敌战略的速决变为持久，我之战略上持久变为战役战斗上的速决。这样，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本来是相反的，互相排斥的东西，但在这个具体战略方针条件下，相反相成地辩证统一起来了。通过无数这样的战役、战斗，不断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既消磨了敌人，达到了我之战略持久，又使敌我总的优劣势逐渐由量变到质变，最后转入战略反攻，驱敌出国。所以这个具体战略方针也是促使敌我之间矛盾互相转化的有效途径。这就是战争中的客观辩证法。那

种把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看成是绝对对立的，凝固不变的观点，是战争问题中的形而上学机械论。

执行这个具体战略方针，还需有一系列的军事原则做保证，才能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战争必然表现为犬牙交错形态和持久战的阶段性，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等几种作战形式的地位和互相配合与因时因地及时变换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为内容服务。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方针，其中心点是进攻。外线是说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进攻的时间，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算掌握了这一方针的实质。因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这是从全国整个抗战过程说的，也是针对国民党的“有退无进”逃跑主义和某些人的“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说的，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则“基本作战形式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持久战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辅之以运动战。持久战的第三阶段，主要作战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作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阵地战不能作为重要的或主要的作战形式，因我不具备打阵地战的条件，且土地广大，也不能处处设防，至于在战役战斗中起辅助作用或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总之，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达成战略上的消耗战。一般说来，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

消耗任务的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这几种作战形式，在目的和效果上，既有程度不同的区别，又是互相联系的，必须从全局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使用和变换，使形式不断适合内容的发展，才能保证“战略上内线持久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进攻战”具体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

毛泽东同志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离不开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它是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直接生动的体现。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战争是敌我双方互争主动的竞赛，其力量的优劣，是主动和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事实上的主动和被动。敌强我弱，我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可以依靠主观指导的正确，能动性的充分发挥，造成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在战役战斗上，集合了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就逐渐在全局上转为优势和主动。相反，主观指导错误，优势也会变为劣势，主动也会变为被动；灵活性是指挥员基于战场的瞬息万变，依照客观情况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及时地变换战术，适时地组织战斗的一种才能。它是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的关键，也是指挥艺术的高度表现；计划性是依据战争的客观情况所制定的作战步骤和方案，它也是赢得战争主动权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强调灵活性的同时必须强调计划性。战争情况是随着敌我双方的行动而变化发展的，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却有某些程度的相对确定性，且依战略、战役、战术范围大小不同而有程度的不同。然而都有一定时期相对的固定性，这种相对的固定性，就是制定战争计划的客观基础。战争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制定和实现计划于战争，较别的事业要困难得多，实行计划又必须带有灵活性，因此，

指导战争必须是灵活性和计划性的统一。既要反对那种基于战争的流动性，而根本否定制定战争计划，毫无定见的战争相对主义，也要注意防止把战争计划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机械主义的错误思想。要求战争指挥者必须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推移，而适时地改变原来计划，使之不断适合变化了的新情况。从这些作战指挥原则出发，毛泽东同志具体指出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乘其过失和空隙以及在决战问题上，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这一切战略方针、军事原则的制定和执行，都是造成优势，力争主动，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方法，都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和具体表现。

（三）从唯物史观出发，实行人民战争全面抗战的战争指导路线，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抗战能动性

要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还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毛泽东同志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等方面，深刻地阐明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实行了全面抗战的战争指导路线。坚持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发挥自觉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只靠一些明智的将军，那是远远不够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调动全国人民抗日的自觉能动性，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就是政治，不能孤立地从单纯军事观点上看待战争，成为战争的绝对主义者。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政治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所谓政治动员，就是

要采取各种形式，把这个政治目的经常地告诉全国人民，使它成为全国军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因而也就实行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野战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加之，明确制定了革新军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树立尊重士兵、尊重人民等一系列方针原则，这样，既调动了全国军民抗战的自觉能动性，又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力量源泉问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全国军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代表我们党提出的结论、预见和一整套抗战主张，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无比正确的。今天重温，依然觉得学不胜学，十分亲切，再一次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巨大威力。我们党无愧于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无愧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理论家。他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功绩，永远不可磨灭。他提供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的精神武器。我们应以毛泽东同志当年分析研究中日战争为榜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研究我

国的国情特点，从中引出内在固有的客观规律，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指导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为此：

一、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周密的调查，客观地、全面地、辩证统一地分析研究我国国情的每一个基本特点。既要看到有利的方面，也要看到不利方面。对于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既要看到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的主观努力而发展变化，不利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有利因素，也要分清那些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那些因素是长远起作用的，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期性，牢固树立“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过去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由于忽视了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国情的基本特点，片面夸大生产关系的作用和随意推行生产关系的变革，结果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使经济建设遭受到严重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急于求成，企图一步登天，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左”的“速成论”和那种只看到困难，失去信心，认为在我国实现“四化”遥遥无期的消极、悲观、失望论调，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认识论的根源上，都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结果，其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二、在现有客观物质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觉能动性，争取最好的效果，加速“四化”建设的进程。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集中总结建国以来工作中

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为我们树立了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过去，揭示矛盾，找出规律，指导实践的光辉榜样。当前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条件，都为我们实现“四化”建设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和客观基础，要把这种可能性尽快变为现实性，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以及每个同志的主观努力，自觉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就成为决定的因素了。这就要求我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执行，同时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照抄照转，一刀切，而要从实际出发，把中央方针、政策同自己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和措施，使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巨大威力。在今后长远的征途上，困难肯定是有的，但那种这也不行，那也不成，无能为力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尊重客观规律，把科学态度同英雄气概统一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做好各项工作，加速“四化”进程。

三、实行群众路线，进一步调动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兵民是胜利之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吸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并要受人民的监

督。否则，将一事无成。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端正我们的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①。这样就能通过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通过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通过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通过关心群众生活和社会主义民主，把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同心同德，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武 文 锦）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0页。

从实际出发确定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原则

——介绍《战争和战略问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是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全党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动员全党认真做好军事工作而写的。

抗战一开始，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党内就存在着分歧。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国民党是正规军，尚不能支持华北战局，游击队要长期与敌军作战，是根本不可能支持的。对游击战争的前途发生了怀疑。他们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身上，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国共两党的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实质上是要把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蒋介石。他们轻视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放松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认为徐州失守后，战略中心应该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方针应该是依靠国民党的正规军，开展山地战歼敌主力，争取战略反攻。在战争形式上他们主张"运动战为主"，"扼守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他们不了解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不懂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把

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这是抗战初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路线上的主要表现。

为了保证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已经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十大纲领》中规定“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①，并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能起决定作用的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②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的指示信中说：“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③但是这些正确的战略策略，却为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们所反对。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指出，芦沟桥事变以后，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这种倾向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反对。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右倾机会主义所做的坚决斗争，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基本上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为了从思想上彻底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先后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着重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之后，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26页。

②见1981年7月7日《人民日报》。

③同上。

再次从分析中国国情及其变化特点出发，提出了确定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原则中的客观依据，强调指出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并再次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指出“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号召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从而取得了全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一、中国革命的道路要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来确定

毛泽东同志根据斯大林关于“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①的科学论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作对比分析，说明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毛泽东同志开宗明义，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普遍原则。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他又指出：“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情况不同，条件不同，执行同一原则的具体做法就不可能一致。这就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原则。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人，从认识论上说，就是不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87页。

遍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就如何把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普遍原则运用于各种不同的条件，作了具体分析，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如果发生了争战，“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要举行起义和战争，必须使资产阶级处于无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有进行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并取得了农民自愿地援助三个条件具备之时才能举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起义和战争的特点是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这是为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了的经验。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是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根据这种特点，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农村长期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当时的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之后指出：“在中国，

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的组织和斗争都是为着战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极端残暴，形成了法西斯专政，根本没有合法斗争的可能，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不论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虽然战争的对象有内外之别，但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同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错综复杂，又是大国，有发展革命武装进行革命战争的充分条件。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武装，就可以创造根据地，创造政权，有效地打击敌人，消灭反革命军队及其反动政权，最后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这又是中国革命的优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历史证明“有军则有权”

为了教育全党重视战争，毛泽东同志讲了国民党的历史，说明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开始一直到创立黄埔军官学校，都是重视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的。又叙述了蒋介石看军队如生命，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军事时代。他说，蒋介石对“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毛泽东同志还叙述了在中国“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还叙述了没有军队的政党，“是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例证。

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之后，毛泽东同志得出了一个结论："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发展起来之后，武装斗争可以创造一切。枪杆子里面不只可以出政权，而且枪又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阐述了马列主义关于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的论点。他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泽东同志从我们党的战争史中，讲了党对战争的重要性的认识过程。他说，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的三四年中，我们党"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乃至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在创造红军的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三次会议叙述了我们党对军队的重要性、战争战略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过程。"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对武装

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六届四中全会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说，上述两次会议，都没有着重涉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反映了党的中心工作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来。一九三三年，党中央迁至红色区域，在战争问题上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主要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了第一位，这是我们党处在战争环境中客观实际情况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指出，经过十七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三、根据情况的发展适时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

战略问题，是受战争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战争的性质制约的。历史向前发展了，情况起了变化，党的军事战略也应该相应的发生变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适时地提出新的战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革命战争分为两个过程、四个战略时

期、三个战略转变，清楚地描述了我党的军事战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他指出，研究战略变化，“可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前，主要的是正规战争。”（这种正规战，在某些意义上，是提高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但同国内战争时期不同，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是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则是将获得良好的装备，集中性和组织性较高，大大减少其游击性的正规战争。三个战略转变，指的是在上述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存在着的三次战略转变，即：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

为什么要实行战略转变，这主要是因为敌我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为了适应敌情和我们的任务，这种转变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就会使革命战争遭到挫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的时候，就曾经遇到不愿向正规化转变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倾向，以及过分看重正规战的过分集中和冒险主义倾向。不纠正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就会妨碍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不纠正过分集中和冒险主义，就会不顾主客观条件，和敌人硬打硬拚，使我军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毛泽东同志为纠

正这两种倾向，“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了过来。”这是讲的第一个战略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季芦沟桥事变之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是两个战争过程之间的转变，是把正规军、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毛泽东同志说这个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期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两种倾向在国民党中都发生过。而我们党却相当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转变。这和党中央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不断进行工作，教育党员，适时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第三个转变，由于情况还没有到来，因而没有着重阐述。

从两次战略转变的情况看，使我们认识到，当着形势进一步发展，党中央要实行战略转变时，总有一些人不能理解，甚至起来反对。所以历史性的战略转变是一个艰苦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是可以接受中央的正确指导，适时实现战略转变的。这已为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

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同志指出，就抗日战争的全体来说，正规战是主要的。但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接着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战略上研究游击战的必要性，就在于大半个中国将成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敌人就会安稳坐占，无后顾之忧，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人更加猖狂，相持阶段很难出现。如果这些情况出现，而无广大的

游击队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理由不从战略眼光来研究游击战争。

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和推广游击战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第一，我们是大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游击战就有可能发生和存在下去。第二，有共产党的领导。古代也出现过游击战，但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就是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象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同志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是进一步说明党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毛泽东同志综合了游击战争十八项优点，归纳起来是：能最广泛地发展群众，发展和扩大党的组织和人民军队；能缩小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能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文化，改善人民生活；最适合于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条件下，瓦解敌人，战胜敌人；能振奋人心，影响全国，推动友军；便于迅速地造就大批领导干部；便于解决给养问题。在长期的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不应停止在原来的地位，而应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变游击军为正规军，变游击战争为正规战争，使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力量。

毛泽东同志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敌我情况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我党两次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做了精辟的分析，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给人们在方法论上以很大的启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所以必须创建人民自己的军队，发展人民自己的军队，这是克敌制胜，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一个法宝。这是原则性。但是，怎样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具体地规定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战略原则，却有极大的灵活性。这就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提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来。毛泽东同志这一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情况总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工作不断取得胜利，就要研究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使自己的思想符合新的情况，制定出新的办法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党在战略转变上，有经验，也有教训。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正确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转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我们没有坚定地实行这个战略转移，而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给党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坚决实现了一九五六年就应该实现的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战略转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产物。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条要点。这十条要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它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又符合中国的国情，有中国的特点，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夺取政权时期，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全党要注重军事问题的研究一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的前途系于四化建设能否成功，所以全党都应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结论上来，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郭　涤）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

——介绍《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一部伟大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著作，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艰难的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日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日本侵略者竭力诱降国民党政府，以集中其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挺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地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敌人的后方，很快的暴露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袭击之下，迫使其不得不回过头来维持其占领区。因此，日本侵略者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占领武汉、广州后，便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军事进攻，对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从而集中其主力开始疯狂地进攻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

英美帝国主义极力劝降国民党政府，企图搞东方慕尼黑。英、美、法在欧洲对德、意法西斯采取了纵容其侵略战争，以便从中渔利的绥靖政策。但他们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

通过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之后，并没有满足希特勒的贪欲。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为了应付欧洲的紧张局面，美、英、法曾于一九三九年六月策划了远东慕尼黑——太平洋国际会议。其目的，就是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便和日寇妥协，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因此，在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他们则对国民党进行劝降政策，企图在不损害其在华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求和投降。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亲美派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在积极准备投降日寇的同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自抗战以来，一贯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战争开始时，蒋介石曾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来削弱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军队。但结果，完全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起广泛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根据地。这是蒋介石当初所料想不到的。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之后，他企图乘机降日反共的活动也达到了极点。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其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一方面作叛卖性的声明："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日本保存四大家族和英、美在华的利益和统治，蒋就同意罢战言和投降卖国了；另一方面作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

会”，发布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文件，如“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强化一党独裁。到一九三九年冬、一九四〇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除在军事上公开用武力对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等地进行疯狂进攻外，在政治思想上则高唱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老调，且雇用了一批反动文人和托派分子大喊大叫，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等。其中臭名昭著者如反动文人张君劢，还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发表了所谓《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公开要求我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阁一旁”。托派分子叶青攻击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是游而不击”，而且还说什么“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又说：“民生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反动论调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达到了高潮。

同时，一些人对党适应新的情势而作出的一些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也不甚了解。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阶级投降主义，提出所谓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则是一切通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错误抗日路线，发展下去，必将重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覆辙，又要使无产阶级丧失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还有一些人不懂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与共

产主义有原则之别，有人认为既然共产党宣布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何必还要坚持什么共产主义呢？发出上述疑问的，恶意者有之，并非恶意者有之，道理上弄不清者也有之。

上述情况说明，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企图借机实现其降日反共的险恶用心暴露的越来越明显了。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思想上对人民力量的进攻和攻击，确实使全国人民从抗战以来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重又陷入烦闷苦脑的境地。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了。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者、组织者、鼓舞者的中国共产党，就迫切需要向全国人民申明自己对于中国革命，对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全部见解，以便彻底剥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精神武装，给革命人民以真正的革命精神武装。

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性很强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而作的。他以科学的态度和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一系列问题，非常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我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时代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具体地制定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指明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一、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历史时代，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真正的社会革命，既不是什么神或天意决定的，也不是任何英雄好汉或阶级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这就是说，社会革命的发生、社会革命的性质决定于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于当时社会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或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其所处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出发，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后，进一步完整的系统的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首先，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出发说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其第一步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文明先进的中国。为达此目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我国自周秦以来，就是一个封建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还是国民党统治区，都

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即现实中国的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就决定了现实的中国革命必然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只有完成了第一步民主主义的革命，才能进到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

接着，毛泽东同志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虽仍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但已不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了。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说明了这一点。

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其准备阶段讲，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中国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就起了一个大变化。在此以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此以后，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这是因为：

第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革命，必然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支持，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支持，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同盟军，成为新的

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毛泽东同志说："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第二，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了。这种领导权的历史变化，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但"五四"以后，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领导责任就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五四"以后，投机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流很快就投入帝国主义怀抱了，民族资产阶级有时虽然还能站在革命的一边，但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已不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了。这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战争，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亿万中国人民进行的。这些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

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上述分析说明：中国现实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国际讲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国内讲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以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了，而不是旧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了。因此，我们说，中国革命，已不再是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了。

在新的历史时代，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革命领导权的中国，企图再走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是行不通的。针对国民党顽固派高唱“基马尔主义”的阴谋和一些资产阶级对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短命的，在今天那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更是不可能了：一、帝国主义不答应；二、社会主义不答应；三、已经觉悟了的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更是不答应。其实，蒋介石的所谓“基马尔主义”，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

西斯专制主义罢了，中国资产阶级企图走旧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的幻想，早该清醒了。当今的中国，出路只能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最终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文明先进的中国而奋斗。

二、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备纲领

中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时期即土地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出发，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不仅明确地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给我们制定了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一）关于政治纲领

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应实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度。

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

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有主要地位，也给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愿意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以地位，以便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主要的敌人。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还指出："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应实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实行这种制度，有利于充分地组织和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以打倒共同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很显然，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列宁一九〇五年曾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更不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国体和政体。

（二）关于经济纲领

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允许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实行节制资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

毛泽东同志指出，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推翻这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它只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农村封建关系要扫除，但富农的经济尚允许其存在，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总之，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这样的经济，其结果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三）关于文化纲领

就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必然要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来为它服务。这种新文化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高度评价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

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新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在文化性质问题上存在的偏向。他正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给我们指明了中国现实应实行的新文化，既不是国民党顽固派所鼓吹的专制文化，也不是马上就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在分析新文化“是民族的”时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征。就是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或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只能吸收其精华，排泄其糟粕，才能有益于我们的事业。就是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将其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形式主义地应用它。否则，只会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这种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的。毛泽东同志这种革命的科学态度，至今仍是我们应当坚持和发扬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他在分析新文化“是科学的”时指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际一致的。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应当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

取民主性的精华。“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同志当时给我们制定的这一正确方针，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他在分析新文化“是大众的”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最后，他特别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的战线。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这些纲领的内容，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还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如在一九四七年，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就进一步明确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但基本的理论，基本的纲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理论、纲领和政策。

三、根据中国革命所要完成的全部历史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和革命发展论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则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但是现在的革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决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就是说，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毛泽东同志这些光辉论断，正确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滥调，极大地教育和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给国民党的喉舌张君劢、叶青之流的所谓“一次革命论”以毁灭性的打击。张、叶之流鼓吹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故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内容，抹煞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狂吠什么三民主义就是一切，共产主义应当收起，现有的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等应统统取消等等。企图以此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毛泽东同志为了彻底击溃这些无耻滥调，详尽的分析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部分与不同部分，并着重指出：共产党愿为之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亲自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决不是反对新三民主义的假三民主义。这些“一次革命论”的鼓吹者，连新三民主义都不讲，都反对，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伙以三民主义之名行反共反人民之实的反共顽固派罢了。因此，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其目的，是反对人民革命，反对人民抗日斗争，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第二、对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空谈主义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教育。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种纯主观的想

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颇为突出，一些党的负责人如李立三、王明等就先后鼓吹过这种论调。抗日战争中，又时有出现。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这种观点，混淆了革命的步骤，对革命也是有害的。他分析说：如果说两个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作准备，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有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

第三、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为使中国革命在夺取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异同点的精辟分析，不仅回击了一切国民党顽固派，而且使一些以为我们只有现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土地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等错误观点，从根本上得到了克服。

总之，毛泽东同志关于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光辉论断，充分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极大地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它使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担负在自

己双肩上的光荣而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它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领导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彻底胜利，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所能担负的。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为夺取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使之在条件具备的时候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英勇奋斗，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一部光辉的马列主义历史文献。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和我们所处的历史新时代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科学地总结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以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独创性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划分为新旧两个历史范畴，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问题，领导权问题，前途问题，以及为此而应实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问题等，从而创立了完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个巨大贡献。

这部伟大著作所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当时，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救国事业，对中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结合现实需要，认真

学习它的精神实质，对指导我们的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种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使我们直接地具体地深刻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了解中国国情，制定党的路线，指明革命前途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提高我们观察、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当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譬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等，只有从历史必然性上、本质上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自觉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完成新时期的巨大历史任务。具体地讲，其意义有以下三点：

一、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我们今天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应加深理解的第一个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指出：“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从民主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绝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在当时，企图搞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走不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也是走不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十多年之后，有人又企图走回头路，去补所谓资本主义的课，更是

走不通的。谁如果一定要走这种回头路，象当年国民党顽固派一定要搞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法西斯专政一样，必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

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能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应加深理解的又一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领导中国全部革命的历史重担落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地位决定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六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的，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找到的公认的革命领导者。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有些人看到我们党犯了错误，就叫嚷什么"你不行，我来"，就企图动摇党的领导，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民懂得，四个坚持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党产的领导。正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决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于那种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三、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应得到的一个重要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上面，这是既符合马列主义基

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理论。我们今天学习它，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我们人口多，底子薄，八亿人口在农村。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国情。我们考虑一切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点。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照搬苏联、东欧的经验不行，照搬西欧、日、美的经验亦不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只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吸取外国有益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子。党的十一届中三全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经验，已经为我们今后的建设，指出了一个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子。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又明确地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国情，对自己现代化建设的路子越来越清楚了。今后只要我们继续循此前进，我们就一定会象毛泽东同志当年率领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那样，我们也一定能够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张 瑞 生）

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纲领

——介绍《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一书，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德国快要被彻底打败了，整个欧洲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胜利了，中国人民处在对日本侵略者实行战略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

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仍然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那种黑暗的路，黑暗的中国命运，已经有人写了一本书，在为其开道，这就是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它给当时和以后国民党政府和中国的命运所规定的方针是：“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其真意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们要全力消灭被其诬蔑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奸党”、“奸区”、“奸军”，或所谓“新式军阀”、“新式割据”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和一切革命力量了。这说明，尽管中国

人民处在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夕，但国民党政府一贯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误国政策不变，与日寇勾结，中途妥协，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严重危险依然存在。一旦抗日胜利，他们就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乘机夺取中国人民八年来浴血抗战所争得的胜利果实，继续实行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到头来中国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穷的旧中国。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财团所控制的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在当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直接关乎着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及其以后中国之前途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即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还是另一个中国，即依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穷的老中国？两种前途，就这样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前途，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应当如何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去反对和制止黑暗的前途呢？这就迫切需要一本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应力争的、所要力争的、一定要实现的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的书。

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张和要求，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

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①的伟大战略任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之而奋斗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中国，所应实行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发出了全党团结起来，与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伟大号召。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人民共同奋斗、胜利前进的伟大纲领。

《论联合政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作为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针锋相对的，为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战斗纲领，集中地阐明了三个问题：

一、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的历史发展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地说明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纲领和政策，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毛泽东同志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在当时，就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领导、动员、组织和统一全国人民的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的标题下，明确指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7页。

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同志接着以大量篇幅，以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论证了中国人民这一基本要求，是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民从切身经历过的历史事实、历史经验中知道，中国自抗战以来，就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误国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不能抵抗和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这条路线的支配下，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总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看作是“头号敌人”，一有机会，就企图限制、加害、消灭之。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或利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机会，或利用英美以同盟军名义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后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条路线是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财团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的，他们只害怕人民觉醒，不害怕丧权辱国；只要一党独裁，不要民主改革。这条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

重灾难，使中国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人民抗战路线。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一条真正能够抵抗和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路线。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解放区，解放了近一亿人口，人民手中有了九十多万子弟兵和二百多万民兵的强大武装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抗击着侵略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抗日武装力量，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重心，战略反攻的主力。各解放区，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的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树立了一面光明中国的旗帜。中国人民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执行的人民抗战路线才能彻底打败侵略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才能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由此得出结论：为着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保卫人民从八年抗战中赢得的胜利果实，为着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新中国，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坚决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反人民的误国路线作斗争，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主义，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动员和统一起来。以上这些，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就不可能在全中国顺利实现。因此，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战时，先成立临时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战后，成立正式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以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有光明

前途的新中国，就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迫切要求。

中国人民的这个要求，是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祸国殃民的政策从反面教育人民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起长期浴血奋战，赢得民心的结果。总之，是中国人民觉醒的结果，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点连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也看到了，只是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场所决定不愿意公开承认它并企图负隅顽抗罢了。蒋介石等人说什么要召开"国民大会"呀！要实行"宪政"呀！要"还政于民"呀！等等，这就是他们企图以此为招牌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对抗中国人民要求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有力证据。

中国人民的这个基本要求，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全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就要胜利了。苏联和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锻炼得更加壮大了，世界各国人民进一步觉醒了。这就为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争取人民民主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有利于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而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势力和各国反动派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就要胜利了。在长期中国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锻炼得更成熟，更强大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解放区，有了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这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想要改变它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国际国内都为实现中国人民的

基本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以彻底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谁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对抗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谁就必然要为中国人民所唾弃，为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

二、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出发，根据当时我国经济、政治、军事、人心向背的客观情势，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决心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但中国共产党认为，站在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一边，走历史的必由之路，是自己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在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一个光明前途的新中国，以实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策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如何与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关注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出发，为着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当时迫切需要实行的具体纲领，作了精辟的说明。

首先，毛泽东同志在阐述我们的一般纲领中指出，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迫切需要一个互相

同意的共同纲领。作为一般纲领，在中国现阶段上，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是相一致的：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也不允许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制度了。因为自从一九二七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窃取第一次大革命成果实行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八年抗战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制度了；第二，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企图建立一个纯粹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国，出自蒋介石等人之口，无非是骗局，出自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党派之口，则无非是幻想。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不容许中国再去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了；第三，现阶段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和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我们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即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决不是针对一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其他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第四，在现阶段只能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下，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这是中国现阶段唯一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公开主张在现阶段不但不革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的命，而且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敢于公开宣布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而斗争；敢于公开申明在现阶段决不

会象苏联那样，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国人民现阶段的基本要求。实行这样的制度和政策，不仅不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相抵触，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走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在，是新民主主义，在将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决心与全国人民一起，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同志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具体纲领，并且相应地提出了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的具体任务。在阐述具体纲领中，贯穿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国民党政府中途妥协。这是当时中国人民避免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前途的一项首要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这个权利是中国人民在八年浴血奋战中争得的，决不允许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对日中途妥协的误国政策。对于一切敢于阻碍破坏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言行，要坚决予以斗争；对于一切敢于用武力阻挠人民行使权利之行为，要坚决予以回击。

第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当时中国人民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一项基本要求。因为，没有一个举国一致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拥护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要实现人民的自由，要实现人民的统一，要实现土地革命，要实现工业化，要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一句话，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是决

不可能的。因此，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和一切革命力量，一定要团结起来，为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

第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途径。在当时，就必须保护和壮大人民的军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证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在我国，民主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革命战争，离开三亿多农民的支持，中国革命就寸步难行，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到农村去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重视农民问题、农民力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在今后的革命发展和建设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必将越来越重要。工人、农民、人民的子弟兵，这是中国革命的依靠，中国革命的主力。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爱国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孤立一切坚持与人民为敌的顽固派。

第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中国人民独立富强的基本立脚点。独立和自由是人民争来的，决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在国内，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已经争到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要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保卫，决不能靠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去恩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不能相信蒋介石“交出根据地”，“交出军队”，“就给你自由”的鬼话，没有一个自己占主导地位的政权，人民已经获得的一切是决不能交出去的。在国际，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决不能靠别人来恩赐。否则，是没有真正的独立和尊严可言的。

第五，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必然要失败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失败。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争取建立一个光明前途的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说明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后，为了保证党的任务的胜利完成，对我们党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这不仅对实现党的七大路线，完成党的任务，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对我们党的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党的事业大大发展了，我们党在全国人民

当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中坚力量。但必须看到，在大好形势下，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我们的工作依然存在着急待克服的缺点。看不到这些，我们就不能很好的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同志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想顺利地实现党的任务，就必须坚持并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史上，在我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用科学的精辟的语言，阐明了党的三大作风，指出它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三个重要标志。其中，特别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把它列为三大作风之首，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百战百胜的武器。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第一个首要标志。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应该永远成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座右铭。

最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实现两个大团结，这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这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我们要把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的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

就要和他团结。总之，在党内，全党同志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要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有了这两个团结，我们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掉，并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总之，《论联合政府》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建设新中国的纲领，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最大利益。《论联合政府》所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总路线，成为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之后，没有落入法共、意共那样“交出人民武装，换来几个部长”，人民依然无权的悲惨境地，相反，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一意孤行，发动了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反革命内战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能够毅然决然地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解放战争，在不长的时间内，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一书给制定和阐明的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迅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论联合政府》是一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革命理论为武器，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正确地阐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革命纲领、革命政策和策略的伟大著

作。它当时说明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胜利完成了。它在说明革命任务时所贯穿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指导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记取历史教训，实现四化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揭示的一个伟大真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社会革命所作的深刻说明。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解放生产力的主要任务，在一九五六年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基本完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从主要是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就看它能否解决好这个新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就是我们当前制定一切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也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历史的客观要求，从而也就很快变成了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推动了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

蓬勃发展。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在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实现四化上，为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二、在我们党的建设上，要始终不渝地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既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风上的完整体现，又是正确坚持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保证。在战争年代是如此，在取得了政权以后的和平建设年代更是如此。总结三十年来我们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忘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路线；忘记了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没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忘记了自我批评这个能保持党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这个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讲，一旦丢掉了三大作风，丢掉了我们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我们就将失去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资格。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正确的。这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四化的实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应当自觉地把恢复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当作攸关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来对待。

三、在我们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任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象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那样，要注意实现两个大团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


2 026 7188 5

基本观点。革命事业是全党的事业，全国人民的事业。只有动员并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有三千多万党员的大党。这样一个大党，没有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团结一致的行动，要领导好四化建设是不可能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虽然是一个大党，但与十亿人口相比，我们仍然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少部分，搞建设和干革命一样，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象毛泽东同志当年指示的那样，在拥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四化建设的基础上，在党内，实现全党的大团结；在全国，实现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有了这两个团结，再加上在国际关系上，不管过去一些人与我们关系如何，只要它今天对我国的四化建设采取友好的赞助的态度，我们就要与他们讲联合，讲友谊。这样，我们就一定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力量、积极因素，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任务。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根据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制定的七大政治路线，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统一和团结的坚实基础，赢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和团结的坚实基础。有了这样的坚实基础，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夺取更大的胜利——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张瑞生）